

郑 州 主 教
贾师谊主教（Luigi Calza）
与
中国的若瑟会修女们

第一部份

Augusto Luca 着

郑州主教

贾 师 谊 主 教

(Monsignor Luigi Calza)

1879—1944

序言

本書是為慶祝若瑟修女會成立一百週年而寫的，提及若瑟修女會，總不能不提它的創始人——河南西部的第一位牧人，即後來被祝聖為鄭州教區的第一任主教——賈師誼。他是誰呢？我想大家對於這位在清光緒末年來到中國，並將其一生奉獻於中國的沙勿略會傳教士，是非常陌生的。

奧古斯都·路加神父是歷史學家，也是本書的作者。在書中，他為我們介紹賈師誼這位重要人物，也讓我們認識他的傳教熱火和傳教歷史。他用照片讓我們回顧傳教區的開始，帶我們跳回到一百年前，也讓我們瞭解賈主教在當時所面對的種種困難。閱讀路加神父的著作，我們可以瞭解賈主教的德行，及其深厚的信德，也能從他身上領略到，那超越於種族、文化、困難、社會、意識形態的愛德，並進而激發我們現代福傳的精神。

1879 年，賈師誼主教生於義大利北部巴爾瑪縣山上的一個小村莊，七歲時母親過世，留下他和妹妹。十八歲時，他進入孔維鐸神父剛建立的方濟各·沙勿略修會（即帕爾瑪外方傳教修會）。1904 年晉鐸後，同其他三位神父離開義大利，前往中國河南，創建沙勿略會的傳教區。1912 年 4 月 11 日，被梵蒂岡任命為第一位河南西部的主教，1912 年 4 月 21 日，在帕爾瑪被祝聖為主教。

賈師誼主教，自 1904 年二十六歲，抵達河南的開始，就滿懷福傳的熱忱，協同修會的其他修士，積極推動當地的牧靈工作，達四十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深厚的仁德、虔敬的精神，與慈悲的善行，是我們所要仿效的。他尤其關注貧窮者、孤兒、病人。因此，1912 年在鄭州建立了第一座免費的醫

院（選擇鄭州是因為它是個偏僻的地方，是個小城市），這是他當主教時，做的第一項工作。

他做的第二項工作，是培育本地神父的聖召，創辦若瑟修女會。主教雖然日理萬機，仍抽出時間每天陪伴修士、修女。1944 年，他在河南面對了更大的災難—— 饑荒、戰爭、迫害。他為此苦心竭力，耗盡了自己的生命，於 1944 年 10 月 27 日蒙主恩召，離開了他心愛的羊群。

上述所言，是賈主教一生的濃縮，無法完全表達他虔誠的信德和愛德。奧古斯都·路加神父收集了當年賈主教在《信德與文化》月刊連載的文章。閱讀賈主教的話語，能夠幫助我們進入他的內心與感情世界，也能夠瞭解他在河南所承受的一切痛苦。

對於曾經接觸過賈主教的長輩而言，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夠喚起他們早年的寶貴回憶。更重要的是，也能夠點燃現今各位心中熊熊的福傳熱火。

童年与圣召（1879-1903）

罗卡波巴尔匝（Roccaprebalza）是亚平宁半岛帕尔玛（Parma）区位于柏柴托（Berceto）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879年7月26日 Luigi Calza（中文名字：贾师谊），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里，父亲名叫若瑟，母亲是安吉丽娜·维思高韦（Angelina Vescovi）。贾师谊是长子，这对年轻夫妇在喜悦中迎来了儿子的诞生，出生后第二天就给孩子领了洗。

两年后他的妹妹出生，名叫德肋撒。遗憾的是，很快地妈妈安吉丽娜在1886年10月27日离开了人世，年仅34岁，当时贾师谊只有七岁，而妹妹德肋撒只有五岁。爸爸若瑟为了给两个小孩找一位母亲而再次结婚，继母也真的如同亲身母亲一样照顾着两个孩子，即使贾师谊已来到中国，还常常邮寄给他家中所节省的东西。

贾师谊在柏柴托读了头几年的小学，十岁时转学到帕尔玛的慈幼会学校，可能是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四年级与五年级，因为柏柴托的小学没有四、五年级。1892年9月，因为想成为司铎，所以就加入了柏柴托的修道院，继续中学的课程。

当时的修院院长是奥密斯达·白莱格利（Ormisda Pellegri）神父，他常常和修生们谈传教工作，特别是孔维铎（Guido Conforti）神父的传教事业，他曾说，孔维铎神父用了他所有的积蓄，为给那些想成为传教士，去中国传教，归化中国人的青年们创立一所小修院。

孔维铎神父在帕尔玛创立了一所小型的「外方传教会修院」。并于1895年12月3日由方济各·马嘉尼（Francesco Magani）主教批准了此修院的章程。

谈论这些，给年轻的贾师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中学毕业以后，就申请加入「帕尔玛外方传教会修院」，位于当时帕尔玛修院后方的金狮街上的一所房子内。

修院院长白莱格利神父将年轻的贾师谊推荐给孔维铎神父时，这样说：《这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年轻人，我相信修院做成了一笔利润丰厚的交易》。

院长又补充说，最好把这个青年学生安置在楼上的大房间＜有更多新鲜空气的地方＞，为的是他健康上的需要。几年后，当年轻的贾师谊向征兵机构提出申请时，这个健康上的讯号得到了证实：“身体瘦高、单薄”，身高1.73米，胸部只有0.78米，因胸膛不够宽大而被宣告免服兵役。

贾师谊于 1897 年 11 月 5 日进入了位于金狮街的修道院，当时年仅 18 岁。修院内除了同时也是教区副主教的会祖以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司铎，名叫李加约 (Caio Rastelli) 神父，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修院有 34 位学生，其中三位神学生，两位高中生：贾师谊加入到高中生的行列，开始第一年的高中课程，而其他的 27 位学生则学习初中的课程。

贾师谊的父亲对贾师谊的决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认为，在孔维铎修院只需付较少的膳宿费，然后学生们就会转入大修道院。1899 年 10 月，贾师谊结束了两年的高中课程之后，接受了削发仪式，并且开始第一年的神学课。

同一年，孔维铎修院的头两位传教士随同方济各修会的富格辣主教 (Francesco Fogolla) 踏上远赴中国的征途，这两位传教士是李加约神父和马尼泥 (Odoardo Manini) 执事。他们前往山西省传教，因为富主教曾是这里的副主教。

1900 年的初期，因为一个抵制外国人及传教士的运动，从中国陆续传来一些令人恐慌的消息。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贾师谊曾对父亲说过，他会像去年从金狮街出发的两位传教士那样，去中国传教。贾师谊的父亲开始感到震惊不安，随着晋升司铎的时期临近，不断地给自己的儿子施加压力，希望他像其他修士那样转到教区的修院。

1900 年 3 月 25 日，若瑟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件，想使他放弃做传教士的意念：

我不阻止你晋升为司铎，也不阻止你成为天主的真正仆人，我只希望你跟我们在一起，与家庭紧密相连，如同十诫所规定的...我们永远爱着你...当你远离自己的亲人、远离家乡时，请想想那会带给我们多么大的空虚和悲痛。

贾师谊没有勇气回复父亲的信件，因此父亲认为他还是想去中国做传教士，所以请求一些亲戚再写信给贾师谊，希望他改变主意，而亲戚们也真的这样做了。

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复活节后几天，父亲带着女儿德肋撒前往修道院，不断地向贾师谊哀求、跟他发怒，然后求见修院的长上，很可能就是孔维铎主教本人。他们即使面对院长也是愤怒相向，并且讲了一些粗鲁的话。在某一时刻，父亲的愤怒加剧，就转向自己的儿子：“比起看到你远离家园，我更希望看到你现在就死去…”。

说完这句话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然后跟女儿一起登上了回家的马车，在路上未发一言。但是他心中却痛苦不堪，感到自己说了很可怕的话；等回到了村

庄，把女儿送回家，然后直接去找神父...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第二天清早，若瑟向修院的长上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请求院长的宽恕；在书信的结尾这样写到：“我将一切交付在天主的手中，我希望我的儿子也这样做。愿天主的旨意承行于地。”

这个圣召需要多大的付出啊！也许父亲、母亲以及妹妹更感受到天主的召叫，天主大能之手使贾师谊变得更加坚强，甚至愿意牺牲一切。

以后的几个月事情变得更加令人担忧，1900年6月20日，德国全权公使克莱孟·冯·柯特勒（Clemens Von Ketteler）公爵在北京被人谋杀。这是叛乱的征兆。一群暴民在义和团的率领下，攻击西方国家的公使馆区，这种围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直到八国联军8月14日赶来之后，才解除了围困。

这次暴乱中，不少的传教士及教友丧失了生命。在山西太原，也就是孔维铎的两位传教士所在的地方，也爆发了宗教迫害，宗座代牧艾士杰（Gregorio Grassi）主教及助手富格辣主教，是两位最早为主殉道的主教，与他们一起致命的还有三位传教士、七位修女、七位中国籍修生以及九位传教的助手。他们是第一批遭受浩劫的天主教徒。

孔维铎的两位传教士逃亡到了内蒙古，才幸免于难，但是不久，李加约神父因为逃亡中的疲惫不堪以及在内蒙古遭受围困而丧命，马尼泥执事则被召回意大利。

2

在中国的新使命

在帕尔玛，孔维铎的这个学生小团体已经从金狮街迁移到练兵场，在圣玛定诺大道8号。在这里年轻的贾师谊继续自己的学业，1900年11月1日他许诺要献身于传教工作，并在12月3日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esco Saverio）瞻礼日宣发修会圣愿。在结束了第三年的神学课程后，1902年5月24日被帕尔玛的主教方济各·玛嘉尼祝圣为司铎。

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罗卡波巴尔匝（Roccaprebalza）举行，想到自己的儿子迟早要远赴中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着父亲及善良继母的心；而贾师谊神父则已经返回修院，为了完成第四年的神学课程。

同年，孔维铎主教被任命为拉文纳(Ravenna)的总主教，1902年6月11日在罗马的圣保禄大殿接受祝圣；1903年1月5日就任拉文纳总教区的总主教。

虽然第一次的传教工作失败了，但会祖并没有灰心失望，他又开始筹划一个新的的工作。由于孔维铎被任命为拉文纳的总主教，加上一些古老修会团体不愿意在他们的传教区内接受这个新的修会的传教士，因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最终，安西满(Simeone Volonteri)主教，中国河南的宗座代牧，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愿意接受孔维铎修会团体的传教士们。

准备远赴中国传教的司铎们是：25岁的贾师谊；23岁的卜懋德(Giovanni Bonardi)；26岁的尚德里(Antonio Sartori)神父和彭伯炎(Giuseppe Brambilla)神父。

授十字苦像礼是在修会团体的小教堂内举行，这教堂1900年创建，在城的南面，位于被称为「练兵场」的地方。总主教孔维铎特意从拉文纳赶来，给第一批准备远赴中国河南传教的传教士们佩戴十字苦像。

1904年1月18日星期一的十点三十分，在修会的小教堂内，孔维铎总主教举行了隆重的感恩圣祭，并在弥散圣祭后祝福了十字苦像，并且为每一位传教士佩戴了十字苦像，在场的许多亲朋好友都深深地被感动。总主教向传教士们表达了最后的问候，我们将全文完整地记录如下，因为这是许多问候中的第一个，特别是因为它包含了我们可以定义为使徒工作的神秘经验。

为了更神圣的目的，天主悦纳了你们的誓愿，你们将自己如同馨香的祭献完全献给天主，并获得接纳。

还有短短的几小时，你们就要远离自己所深爱的土地，这块土地气候迷人、科学、文学及艺术博大精深、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繁荣昌盛、生活富裕，但你们去中国是为了向人宣讲福音。

我还有其它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羊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这是我们灵魂的牧者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讲的话。因此，首先是宗徒们，然后是世代无数慷慨的人们接纳了这预言，并且努力地去实践。

同样你们也慷慨地接受了主耶稣的这句话，将一切宝贵的事物、一切合理的亲情牺牲，并奉献给天主；你们许下要将福音之光带给仍然生活在错谬与死亡阴影下悲惨的中国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令人心酸的事情正在上演…

各种磨难正等待着你们！可能还包括殉道的花冠！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你们，任何东西都不应使你们惊慌，你们胸前所佩戴的十字苦像将带给你们慰藉，并成为你们的喜乐、你们的一切；祂曾为了救赎人类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你们应当在祂身上学会为弟兄们牺牲。

天主的恩宠也会安慰你们，并且永远不会缺少；这份恩宠使意志薄弱者成为坚强者，并使我们在各种严峻磨难中重复以下的话：「在任何磨难中都非常喜乐」。

在你们即将远离的土地上，将有无数的人分享你们的喜乐、分担你们的痛苦忧愁，许多人愿意共享你们的幸福和辛劳的美果，这样的想法会带给你们莫大的慰藉。希望你们最后能获得永生的赏报，那为善良忠信的仆人所保留的百倍赏报也会带给你们安慰：你们将**领受百倍的赏报并且承受永生**。天主将计算你们的步伐，并且收集你们的每一滴汗水，将它们变成珍贵的宝石。

几周前基督的代表教宗，全心颁赐给你们的宗座降福会带给你们安慰，更不用说昨天教区的主教给你们的降福。

即使日后没有流血致命的殉道者，但永远不会缺少忘我牺牲的殉道者、受苦的殉道者，不断的殉难，是比真正的流血更加严酷的殉道。

就像依撒意亚先知一样，我也给你们说：你们去安慰那些可怜的人们吧！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救恩之路，我衷心地呼求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陪伴你们。

或许因为仍然记得那次的远离对年轻的贾师谊神父是多么大的代价，所以在不久之后，孔维铎主教给自己的子弟们写了一封信仰规劝信，发表在他亲自编辑的 1921 年的《沙勿略会宪》第 184 条款内：

传教士应当将自己视为归化外教人的自愿牺牲品，与基督一起拯救整个人类，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最高的荣誉。衷心祝愿有朝一日，牺牲一切能够前往工作的园地，随时准备好奉行天主在合法长上的命令中所彰显的旨意。

选择了福传工作，就意味着完全地奉献自我，作为拯救世界的自愿祭品。从出发的那一刻，就开启了自愿的自我牺牲。

3

贾师谊神父在中国（1904-1911）

由马车所组成的长长的送行队伍，陪伴四位传教士到火车站。他们乘火车离开了家乡，孔维铎主教一直把他们送到皮亚琴察(Piacenza)，他们要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接受该城主教若翰·斯卡拉博利尼 (Giovanni Battista Scalabrini) 的祝

福，这位主教是「意大利关怀海外移民」的始祖。在皮亚琴察由安多尼·萨瓦尼 (Antonio Savani) 神父陪伴他们直到热那亚 (Genova)，1904 年 1 月 21 日上午八点三十分他们乘坐 Norddeutscher Lloyd (德国北方皇家) “龙” 号汽船离开意大利。

经过 61 天的长途旅行，四位传教士终于在 3 月 24 日到达了靳家岗（今天的靳岗）。当时靳岗是一个小镇，距离南阳府只有七公里，在河南省的南部，是宗座代牧的公署。为免遭土匪的袭击，整个代牧公署由高大的城墙维护，到了晚上，城墙的所有门都要关闭，不许任何人进入。

孔维铎的四位传教士受到了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神父们的热烈迎接，并且与他们建立了坚固的友谊。他们都穿戴得像中国人，头上要戴假辫子，等到头发长了以后再替代假辫子；他们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要专心学习中文。贾师谊神父、彭伯炎神父，还有一位中国神父，被派遣到北方的襄县，宗座代牧有意将此地委托给帕尔玛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作为传教中心。

贾师谊神父的微笑、彬彬有礼以及所表现的特殊善良、仁慈的态度，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好感，教友们都很喜欢他，而外教人则以惊奇、钦佩的眼光观察着这位亲切有礼的年轻传教士。

两位传教士身边有一位年老而富有经验的神父——安杰罗·嘉塔内奥 (Angelo Cattaneo) 神父，他在中国已经工作了 34 年。几个月后，贾师谊神父被委托管理白庄的一小群热心的教友。而彭伯炎神父则被派遣到禹州，那里可能没有什么教友。其他两位司铎，尚德里和卜懋德，则留在传教中心，尚德里在辅助传教工作，卜懋德则负责管理财务。

贾师谊神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开始认识并喜爱自己的教友，但是一件悲惨的事件打乱了原有的计划。1905 年 4 月 5 日的夜里，在河南省东北部的鹿邑县有几个携带刀剑、步枪的中国人闯进了教会，他们袭击了传教士，然后留下半死不活的传教士就离开了。他们不是当地人，因为那位受伤的司铎并不认识他们。

那位司铎伤势十分严重，所以需要有人替代他，因此嘉塔内奥神父立刻赶来事发地点，七月就请贾师谊神父过来，因为需要他照顾这些受到严重惊吓的教友。

贾师谊神父很快就适应了当地教友的情况，但他觉得当地特殊的问候语很奇怪：“神父，你吃饭了吗？”；连孩子们与女人们都这样问候他，这是在其它地方不会发生的事。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妇女们必须闭门在家，而传教士们也不能接近她们。但在鹿邑，妇女们享受着较多的自由，因为她们都是教友，甚

至还有许多是传道士。

1906 年，沙勿略修会风来仪神父（Pietro Uccelli）与贾师谊神父一起在鹿邑工作，他写信说，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和自己家乡一样的、都是教友的村庄。那里有三个乡村，一个挨着一个，居民确实几乎全是教友。鹿邑的居民最骄傲的是：他们是从法国传教士董文学神父（Gabriele Perboyre）手中领的洗，这位传教士于 1840 年时为主殉道，有些老年人仍然记得他。

4

贾师谊 (Luigi Calza) 主教 — 宗座监牧

贾师谊神父曾希望宗座代牧将鹿邑的福传工作委托给帕尔玛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因为他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并且此地教友的信仰历史也非常悠久，但并未能如愿，因为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非常珍惜地保留了整个河南省东北部的福传工作。不过在鹿邑一年多的传教生活，使贾师谊神父获益匪浅，因为他了解了中国人的性格，也懂得了传教员在传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因此，当他一成为传教区的长上，就从那些天主教历史比较悠久的地区找寻传道士。

在帕尔玛传教士杂志“信仰与文明”（1903 年 12 月，试刊号）上刊登了第一批前往中国的传教士的新闻，这个讯息将事情复杂化了，原因是其中的一篇谈到了河南的传教历史，提到传信部决定重新划分这块辽阔的土地，将河南省东部地区委托给孔维铎主教的修会团体。事实上，传信部并没有任何意愿划分新的传教区域，可能是传信部的职员曾经跟孔维铎主教或者其他人私底下提到过。要等将来若当地教友的数目增加，缺乏传教士时，才会考虑这事。

这个传言当然也不能瞒过河南的宗座代牧安西满主教，他立刻提出一个相反的划分意见，那是一片几乎未曾开垦的处女地。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非常注重现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已经开展了许多年的工作、投入了很多的钱财，所以希望在未来的划分中，这区域仍然属于宗座外方传教修会团体的管辖。才会急于将河南的西北部地区划给帕尔玛的传教士们，那边主要是山区，人们也还不认识天主教会。

只是当宗座代牧刚刚将划分的建议提交给罗马时，就突然去世了，那是 1904 年 12 月 21 日，他的继任人是安杰罗·嘉塔内奥神父，他曾大力协助过我们的传教士们。

安杰罗·嘉塔内奥神父采用了已故安西满主教的计划，但增加了黄河岸边的郑州市，当时只是一个小城市，各种工业刚刚起步。只是他不愿意将铁路西部的密县、新镇以及禹州划分过去；这些地方在地理上属于西边，算是沙勿略传教士们的管辖区，但在行政上则隶属于开封监牧区，是河南的东部地区。

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与帕尔玛会的传教士们就为此事相互起了争执，不过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敌意，事情发展到最后，传信部做出了有利于沙勿略传教士们的裁决。

1906 年从意大利又来了三位同会弟兄，龙高升 (Leonardo Armelloni) 神父、柏长青 (Eugenio Pelerzi) 神父以及凤来仪 (Pietro Uccelli) 神父。他们给贾师谊神父带来会祖的一封信，信中有把河南西部成立为宗座监牧的法令，并任命贾师谊神父为宗座监牧。

我们让大家知道贾师谊神父是多么的受人尊重。当主教向人征询作宗座监牧的适当人选时，大家一致同意贾师谊神父是最适当的人选；卜懋德神父于 1905 年 7 月 10 日在襄县这样写到：

贾师谊神父是真正的传教士，温和但不懦弱、意志坚定但不冷酷、圣德出众但不傲慢、热情勇敢但不鲁莽。只要与他接触几天，就会意识到他具有高尚的情操，并且还具有一种高贵的优越气质，这种气质不但不会使人厌恶，甚而使人更尊重他、爱慕他。的确，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神父们以及教友们对此都达成共识。

孔维铎主教曾陪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们到罗马，并觐见了教宗比约十世，然后一直到那波利（那不勒斯），他曾交给传教士们他的第一封信件，所注明的日期是“拿波里-1906”。

他请传教士们感谢天主经过传信部赐给他们这个传教地区，并邀请他们在天主纯洁的葡萄园内勤劳地工作，专心注视耶稣，祂是被召唤者的模范，他们应当在生活中活出他们所宣讲的天主的信仰。

在你们神圣的职位中会遇到许多的苦恼与困难，但是你们永远都不要灰心失望，要想天主正在注视着你们的辛劳与奋斗，祂要将这一切都记录在生命册上。如果一位传教士每天不热情地将纯洁的祭品（基督）呈献给天主，就不可能持久地奉献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人灵，就是说：就不可能享受与基督同受苦难的喜乐。

然后劝勉自己的传教士们要在弟兄友爱中一心一德。最后他以下面的话做结

论说：

再见啦！我的喜乐与冠冕！如果你们能够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我能够给你们表达我此刻的感受，那么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们，多么地祝福你们！最了解我的软弱的天主，必定会支持我充满热情的祝福，愿祂以恩宠陪伴你们，满足你们的各种需要。

贾师谊神父经过会祖，接受了被罗马任命为河南西部地区的宗座监牧的职务之后，在 1906 年夏天又回到了襄县。这个地区有 32000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八百万；绝大部分是山区，没有什么教友。在平原地区大概有 800 教友，但也都是新领洗的，因此信仰都还不深。

1906 年 10 月 10 日的一封信件中，贾师谊神父这样描述这个他将要工作的地区：

委托给我们管辖的河南西部地区是很贫瘠的地方：传教所需要的住所、通往各县城的火车站、学校、祈祷所等等什么都缺乏。因此需要从最基本设施开始。

河南省有 28 座城市，但绝大部分的城市传教士从未到达过，所以也就从没听过我们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居民不认识也不爱天主，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的灵魂，但他们还生活在死亡的阴影内。

（…）要使整个民族认识并爱慕天主；要使这些灵魂都能够得救；要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们、净化他们、拯救他们。基于这些理由，我恳请所有善心人士在天主面前为这些可怜的灵魂偿还罪债，为他们恳求恩宠与悔改。

贾师谊神父在写给自己修会会祖的信中说到：他们将要传教的地区是“荒芜的、未开垦的”，意思是说，在几百万的居民当中，教友实在是太少了。房子很少，也不适合住，使得传教士们没有可住的地方。总之，房子除了又狭窄，又不舒适，数量也不够。

在襄县有一座小教堂，但是传教士的住所只有两个小房间，一间给传教士住，另一间作为祭衣室；周围还有几间快要倒塌的草房。

在白庄有一个小小的住所，只够一位神父居住。在牛庄和禹州亦然。牛庄的住所情况是最好的，因为是由砖块砌成的，而其它的则是由土坯搭建的。

正因为连住的地方都是问题，有人给贾师谊神父推荐一位中国司铎作助手他也没法接受。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曾建议宗座代牧将北京至汉口铁路

旁边许州（许昌）的驻地转让给沙勿略修会的传教士们，但这件事是后来才落实的。因此那时急切需要为传教士们盖房子住、寻找传道员、建立学校与祈祷所。

孔维铎主教寄来一些钱，但在 1907 年 4 月 3 日的信件中建议贾师谊神父说，进度一定要缓慢，不要背负债务：

今年卡耳第诺（Galdino）修士仍然要到处寻求募款，如果募款的结果不错，希望能够为修院带回明年冬天需要的经费。

综上所述，孔维铎主教的传教士们，除了襄县、白庄、牛庄和禹州四个驻地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获得了铁路沿线的许州（许昌）驻地；1907 年尚德里神父分别在鲁山和宝丰购买了房屋做为教会；彭伯炎神父在临颍县建立了一个教会；尚德里神父还在禹州也建立了另一座教会。

不久以后，其他的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中国：1907 年有艾神父（Vicenno Dagnino）与鲍慧林神父（Disma Guareschi）；1909 年有 Corrado Di Natale 神父和蒲神父（Francesco Saverio Pucci）；1910 年有巴友仁（Assuero Bassi）神父及姜神父（Stefano Chieli）。他们是一群充满传教心火的传教士。

5

艰难时期的开始

贾师谊神父刚刚被任命为宗座监牧不久，就建议在洛阳成立一个教会，洛阳曾是公元前八世纪周朝的国都。1909 年 9 月底，贾师谊神父派遣尚德里神父前往洛阳，经过了许多的困难，在那里购置了一座房屋。之后，当贾师谊神父做了宗座代牧，又派遣柏长青神父去洛阳，他后来成了洛阳以及整个附近地区真正的福传使徒。

宗座监牧贾师谊神父挂虑的另一件事，就是想在郑州购置一座房屋，因为这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是南北铁路与东西铁路的交汇点；因此就委派彭伯炎神父负责此事。1907 年 11 月他首次派凤来仪神父前往郑州服务。

很遗憾，两位传教士年轻的生命很快就被疾病夺去。艾神父逝世于 1908 年 7

月 4 日，他在中国传教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过世时 24 岁。第二年（1909 年 7 月 26 日），Corrado Di Natale 神父也离开了人世，只有 23 岁，他到中国只有短短的 40 天。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悲痛，尤其是作为会长的贾师谊神父。现在他们只有九位传教士，其中还包括宗座监牧。

在这种悲伤的情况下，1910 年 10 月修会会祖的一封信件转到了宗座监牧的手中，信中告知：母院院长白菜格利神父想回到教区从事牧灵工作，因此需要对母院采取响应的措施；会祖认为需要召回卜懋德神父作院长，尚德里神父作神修导师；他们两位在 1911 年 3 月 21 日返回了意大利。而替代他们的两位司铎是文焕有神父（Amatore Dagnino）和博神父（Elio Prina），他们在同年五月从意大利出发。

从召叫卜懋德神父以及尚德里神父回国之事，我们看到贾师谊主教与会祖之间的默契，贾师谊主教对自己修会会祖的敬重与爱慕，还有对修会困境的深深理解。

贾师谊神父注意到中国的发展以及天主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首先，他为教会购买土地之事担忧，因为地价越来越昂贵；中国外交部长也抱怨没有任何中国神父被任命为教会的负责人。不过很遗憾，实现这个愿望还需要等待一段时期。

贾师谊神父已经意识到在法庭为教友作辩护的危险，因为有时候教友可能就是真正的罪犯，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流氓、作恶者成为教友的目的只是为得到神父们的保护，这样就会损坏教会的好名誉。

6

清朝的覆灭

清朝（1644-1912），尽管是外族血统，但因着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三位皇帝的英明领导，也能获得盛名，声望极高，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繁荣昌盛。但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皇朝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那段时期，也是西方国家开始与清朝频繁交往的时期，因而引起了某些冲突与战争；由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1840-1842），是强迫中国做毒品交易，战争最后是以中国被迫向外国人开放五个港口而告终，即

广东、上海、澳门、福州和宁波；而将香港及其周边地区割让给英国。

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变本加厉，而中国人的愤怒也忍无可忍，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表达对外国人的仇恨。

从那时起，也开始了推翻清廷的运动，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反对慈禧太后的事件上，因为她变成了清朝大权独揽的统治者。

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股新的思潮，革命的思潮，他们反对满清王朝。1905年，孙逸仙博士（1866-1925）在广东创立了革命运动“同盟会”；由不同人物所领导的各种起义之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汉爆发了军人暴动，这样就开启了南方省份的分裂以及军队向皇城进逼的步伐。1912年2月12日，清朝覆灭，5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

起初，它给予人们很大的希望，即使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看亦然；甚至看起来更有利于天主教会，因为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逸仙是基督教徒。此外，人们认为妇女们的地位将会改善，因为男女平等的概念已经撰写在领导者的方案内。

但是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实权掌握在袁世凯的手中，他曾是清朝军队的总统领，后来他妄想复辟。

7

贾师谊主教被任命为宗座代牧（1911-1912）

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廷目睹了帕尔玛修会的传教士们在福传地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建议任命一位宗座代牧。

孔维铎主教依照当时的惯例，向传信部推荐了适合担负宗座代牧的三个名字，名单中第一个名字就是贾师谊神父；对于贾师谊神父，修会会祖在1911年8月19日的信件中，这样加以描述：

他极具才华，又有很高的修养；除了熟识古典语言，还精通中文和法文，并流利地转换两种语言。很多情况下都显示坚决的意志。此外，他信仰虔诚、举止稳重、品行完美、面容慈祥而端庄；看上去就是天生的领导人…。处理事务时机智、老练，也有充沛的精

力，甚至轻松地战胜许多困难，尤其具有伟大的忘我精神及高昂的传播福音的心火。无论是作为长上还是作为一位真正的传教士，都深受同会弟兄们的喜爱与尊敬。

在这个履历报告不久，虽然他曾多次在给修会会祖的信件中表达他不愿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贾师谊神父仍被任命为宗座代牧。

他对被任命的反应，可以在他写给修会会祖的信件中看到，时在 1911 年 11 月 22 日：

我感觉上主所赏赐我的这一切好像一个梦。我深知自己的脆弱与不足，一想到将来，就会担心害怕。祈求仁慈的天主予我宽宏、慷慨之心完成天主的意愿，直到生命的终结。为我所钟爱的传教使命，我愿意牺牲全部的自我以及其它的一切。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由从前的宗座监牧提升为宗座代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短短的几年内，传教工作蓬勃发展。在宗座代牧区内，教友由原来的 800 个发展到 3800 个，并且还有 3000 个慕道者。除了主教之外，传教士们只有 11 位，传教驻地也只有 11 处；唯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主教身边有很多与他合作的中国人，即 64 位男传道人及 10 位女传道人，56 座男性教理学校和 10 座女性教理学校，一座有 34 个孤儿的孤儿院。这些都刊登在 1912 年 1 月“信仰与文明”的杂志上，由贾师谊神父在“1911 年度报告”中所写的。贾师谊主教在鹿邑时就了解传道员们的重要性，因此就从附近教区请来许多传道员，他们可能大多数来自鹿邑。

许州和襄县修建了两座美轮美奂的教堂。在那两个城的乡下则建立了 66 座小型祈祷所。

许州的教堂是在比利时工程师爱德蒙·赫根道尔芬帮助下，由卜懋德神父所建造的，计划将来做为宗座代牧的座堂，因为这座城市坐落在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在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贾师谊主教却留在襄县，龙高升神父在那里也建筑了一座美丽的教堂。贾师谊主教没有迁移到许州的原因，可能是希望能够在郑州购置一块理想的土地，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发展成熟。

在帕尔玛被祝圣为主教，1912 年 4 月 21 日

祝圣主教的日期因着前面所提到的紧急事件而延迟。待情况稍有改善，新被任命的宗座代牧因为修会会祖孔维铎总主教的心愿，启程前往意大利，在帕尔玛主教座堂接受主教祝圣礼。

4 月 10 日，孔维铎总主教就向神职界和帕尔玛的乡亲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要在主教座堂祝圣河南西部的新宗座代牧贾师谊为主教；并且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图画，描述传教事业的近况，讲述在这六年内所获得的传教成果，还劝勉所有的人“为如此喜乐的大事而欢心喜悦，因为这不但显示了人类救赎工程的神圣生命力，而且也进一步显示了所有民族之间的弟兄情谊，因为普世民族在天主上智的恩宠内，都要在同一牧人带领下来到同一个羊栈。”此封信也刊登在 1912 年 4 月的“信仰与文明”，第 61-66 页。

1912 年 4 月 21 日的那个主日，帕尔玛市内所有的钟都敲响了节庆的乐章，钟声从八点半直到九点长达半小时之久。主教座堂内挤满了庆祝的人们，主教的祝圣礼从九点开始，贾师谊神父由孔维铎总主教手中接受祝圣，参加共祭的主教有卦斯塔辣（Guastalla）及彭特莱莫利（Pontremoli）的主教们：安杰罗·费奥利尼（Angelo Fiorini）主教和奥斯定·卡塔乃奥（Agostino Cattaneo）主教。贾师谊被祝圣为主教时只有 32 岁，是当时教会中最年轻的主教。

孔维铎总主教主持了证道礼，赞扬教会在各个时代都将福音传扬到世界每个角落，他并让人回忆传教历史中意义深远的事件，最后将话转向将要成为教会伟大使命的继承者 - 新祝圣的主教：

现在您拥有了圆满的司祭职、满全的精神父性，您就走向中国那个民族，向他们宣讲和平以及由和平而来的所有益处，使他们认识并爱慕耶稣基督，我们的一切美善都来自祂。耶稣基督让您的声音使一切邪神的祭台粉碎倒塌，就像耶利哥的城墙一听到司祭的号角声就塌陷；让真理之光照亮所有人的理智、炽热并强健所有人的心灵。您挂在肩上的十字架将是轻省的 ...，并且您应常常记得，基督在我们之前已经承担了那个重负，已经畅饮了那个杯爵；只有当您爱慕并受苦时，您才能够成为基督救赎人灵的合作者。

阚神父在他记录的贾师谊主教的生平中，也讲到这点，同样，若瑟·贾师谊 - 新祝圣主教的父亲，也铭记这些，他肯定参加了这个典礼，非常可能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坐在第一排；他非常感动，眼含热泪，再次想起多年前的那个顺服行为：“愿天主的旨意承行于地。”他的儿子注定要达到这种伟大的地位！

同年6月17日，贾师谊主教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教宗比约十世的私人接见，教宗以慈父的心肠询问福传工作的发展情况，并以言语加以鼓励，最后给予宗座降福。

此次接见以后，贾师谊主教再次启程返回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况，需要他与他们同在。

1912年9月3日，修会会祖孔维铎主教在修会母院的致命圣人小教堂向贾师谊主教告别说：

您是河南西部的首位宗徒，后代子孙都将祝福您。当那块土地接受了信仰和福音，您就会明白他们所领受的恩宠是多么的宏大，到那时帕尔玛教会的名字也将同您的名字一起被祝福，因为是这个教会赋予了您重生、培育您成为司铎、成为宗徒…。

然后孔维铎总主教赠送将要远行的贾师谊主教一份厚礼，“这份厚礼将所有的美善倾注给那些堂区”；奉献给贾师谊主教的礼物是一位年轻的宗徒安神父（Angelo Binaschi），他在新主教曾经生活过的修院内成长：

不要随身携带金银，要携带一颗伟大的心，一颗为了拓展基督王国而时刻准备好忍受各种考验的心：我不知是否还能够给予您比这更宝贵的礼物。在您艰难的使徒生活中去操练这颗心，希望他能够成为你忠实的合作者。

9

重返福传岗位

贾师谊主教在9月3日从帕尔玛出发，经过一个半月船上的颠簸，终于抵达中国。1912年10月15日，许多神父和教友在许州热烈期待他的到来，这是传教地区内的第一个火车站；火车直到晚上七点才到达，周围已经漆黑一片，当

火车停好后，立刻有很多教友手中举着火把跑向主教，整个火车站都充满了光明。贾主教从火车站走向教堂，那里也已经站满了教友。这是一个伟大而喜庆的日子。

贾师谊主教在许州停留了两天接受中国官员的祝贺，并且也探望了几个教友家庭。

第二天清早就离开，前往襄县，他的主教驻地。沿路在牛庄做了短暂逗留，这是一个许州附近，全是教友的村庄。主教向聚集在一起的教友们讲论他曾在教宗面前谈到过他们，说他们是虔诚的教友，教宗还给予了他们很特殊的宗座降福。

下午，主教终于与陪同他的司铎们到达了襄县；看到龙高升神父已经将漂亮的教堂建造完毕，非常惊喜。

星期五下午以及整个星期六要连续地接见政府官员与教友；第二天，10月20日星期天上午10点，在有三中殿（*tre navate*）的小而令人喜爱的主教座堂内，举行了隆重的主教大礼弥撒，主教的证道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几天之后，贾师谊主教给在帕尔玛母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912年11月3日：

我不能用言语向您表达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心中的感受，我感到我已经加倍地与这块土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今生要用汗水浇灌的园地，如果天主愿意，我愿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它，为使河南西部这个年轻的教会能够成长茁壮。

那些日子我们有一张团体照，其中有主教和所有的传教士们。在第一批传教士中，除了主教外，只留下了彭伯炎神父；然后依照到达中国的日期，有龙高升神父、柏长青神父和凤来仪神父；在艾神父和 *Di Natale* 神父去世后，还有鲍慧林神父、巴友仁神父、姜神父、文唤有神父以及博神父；最后随从主教而来的安神父。

在那张照片上只缺少了 *Pucci* 神父，他因为生病很早就离开了中国。他看到病情没有康复的希望，在誓愿结束后，选择回到自己出生的 *Mileto* 教区，属于 *Catanzaro* 省。

筹备未来与建立郑州医院

当帕尔玛的传教士们在 1904 年到达河南时，郑州只是一个二级的行政区，但是正朝向工业中心发展，不但吸引着中国人，许多欧洲人也蜂拥而至；欧洲人在这个城市开发了许多专属的区域，几乎是殖民地了。郑州是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及上海至洛阳铁路的交汇点，因此郑州变得十分重要。

贾师谊主教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点。他知道从 1904 年开始就有些教友商人来到郑州，并且定居下来，那些人创造了对天主教会非常有利的环境。因此，大概在 1906 年的年底，当时还是宗座监牧的贾师谊神父就派遣彭伯炎神父在一位传道员的陪同下前去探查；彭伯炎神父成功地购置了一座房屋，并将那位传道员留在那里。

第二年，宗座监牧贾师谊神父又派一位满怀传教热忱的凤来仪神父前往郑州，其职责就是创立一座传教站。凤来仪神父以其努力敬业的使徒工作赢得了欧洲人以及老百姓的喜爱。

1908 年庆祝在郑州的第一个复活节，教堂内坐满了当地土生土长的教友及许多欧洲教友。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感恩祭以咏唱的方式举行，60 人领受了圣体；在弥撒前后一共有 90 多人领受了和好圣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凤来仪神父就在霍庄、双槐树、商水县(Se-sui-xian)、原阳县(Jung-yang xian)以及新郑县(Singe xian) 开办了小型教友中心。

1912 年 4 月 21 日，贾师谊神父被祝圣为主教的时候，在帕尔玛印刷了《远东的帕尔玛》的杂志特刊号，上面刊登了一篇赞美凤来仪神父的文章，现在我们只摘录第 41 页的一部分：

由于传教工作的需要，凤来仪神父于 1907 年秋季，在郑州建立了传教站；并且因着他刚强有力的恒心及拯救人灵的热忱，传教的新视野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他在教堂内、学校里以及其它任何需要宗教慰藉的地方，从事宣讲与慈善的使徒工作。他在传教路途中接触人们的困难和痛苦，遭遇过外教人的反对，尤其是要面对政府官员的虚伪，他们口蜜腹剑、阴奉阳违，试图阻碍信仰的工作。但是这些都不能使凤来仪神父灰心丧志，反而以坚强的意志力以及面对天主的注视，尽力地继续为天主拯救人灵。

1909 年的 9 月，凤来仪神父到郑州已两年，他这样写到：“我来到这里时，

只找到十个教友，而现在已经超过二百位教友了”。

凤来仪神父在郑州大约工作了四年，然后由巴友仁神父替代他继续在此地工作，因着他精通中文以及懂得法文和英文，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这样也使他更易于接近那些在郑州市内居住的欧洲人。此外，他文雅、彬彬有礼的举止也赢得了众人的喜爱。

1912 年，贾师谊主教经过帕尔玛以及意大利援助国外传教士协会的帮助，在郑州市城外，火车站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土地；他请人修建了长 600 米的砖块围墙，准备建筑未来的教堂。贾师谊主教派遣了龙高升神父前往，而龙高升神父也确实有建筑师的特殊才能，事实上，就是他负责建造了后来的主教座堂及郑州市内其它的建筑物。

除了在郑州市内保留一座寓所之外，贾主教还计划在刚购置的小块土地上建造各样的工程；首批工程之一就是设立一个诊疗所，以援助贫穷人的急需，后来这个诊疗所会成为一座规模很大的医院，并且不断地加以扩建与改造，这医院直到现在还在。

11

洪灾、饥荒与土匪（1913-1916）

在河南省的工作不是每件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1913 年贾师谊主教从意大利返回不久，就开始下起了大雨，大水溢出河流，而造成洪水泛滥；紧接着这个自然灾害之后，又发生了饥荒，因此饿死了许多人。

传教士们还因着反基督教运动的兴起而痛苦倍增，河南省西部的教会出了第一个为信仰而致命的殉道者，此事发生在洛阳城附近，当时名称为洛阳府。他是首批皈依教会者之一，是一位老人，名叫岳召舍；他的皈依激起了家人及邻人的反对，因此他们捣毁了他的房屋，并以虚假的罪名将他收监入狱。政府官员审理了他的案件，无罪释放，还其自由；但是在 1910 年五月初，来了十几个人在他家中攻击了他，并将他杀害。

同一时间，饥荒仍然肆虐横行，贾主教在 1913 年 3 月 17 日这样写到：

在我的周围，人们都在遭受痛苦，死于饥饿。如果不是每天被迫成为这些事的见证者，

我几乎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痛苦与绝望的情景。（…）我在中国已经十年，但我从未见到过这么大的恐惧感，因为受害的不是几百人，而是几百万的人在干旱的土地上，四处找寻微不足道的树叶或野草用来充饥。

想到太多的妈妈们目睹自己的儿女活活地被饿死，贾主教的心几乎就要被撕裂。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遗弃在路边的婴儿，有些父亲必须在：或看着自己的女儿饿死，或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卖给某个富人做小妾，进行痛苦的抉择。更大的痛苦是看到一些刚刚出生，或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被抛弃在路旁，或者某个角落，任其饿死或渴死。

传教士们命几个教友收容那些仍然活着的婴儿，并将他们带到传教士们的寓所；有些妈妈在夜间将自己的孩子放在传教士们的寓所前面，希望孩子们能够被救。在禹州，彭伯炎神父每天在他的寓所前面都会发现三、四个婴孩，而凤来仪神父在许州则用了一周的时间收留婴孩。传教士们将收留的婴儿交付给某些热心、善良的妇女教友照顾，但是许多的婴儿在最初的几天就死去了。此外，教友们也生活贫困遭受着饥饿的折磨，自顾不暇。

贾师谊主教在自己的住所也收留了许多孩童、寡妇和老年人；生活物资很快就消耗殆尽，因此主教向意大利写信请求援助，才能帮助人们度过如此严重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贾师谊主教想到了意大利教友慈善援助机构以及那些热心献身于照顾被离弃的儿童、老年人以及各种灾祸的修女团体们；他还计划向教廷请求援助，但同时，中国修女的帮助也是非常宝贵的。

贾师谊主教当时深信，由于中华民国的民主思想，妇女们将会获得更多自己的空间，修女们也将能够前往家庭探望病人、教育妇女以及许多其它的教友爱德工作。在那时，这只是一种梦想，因为时局实在动荡不安。

在北京，袁世凯正发号施令；1914年，他企图恢复帝制，宣布自己是皇帝，但是南方的许多省份强烈反对，使得他不得不辞职。三个月后，于1916年6月去世。

中央政府未能掌控全局，在许多省份都各自建立了军政权，并且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这正是所谓的“军阀”时期。逃兵或绝望的人们，成伙袭击村庄，甚至城镇；慢慢地他们就形成了真正的军队，例如著名的“白狼”军，他们拥有5000名士兵，到处制造恐慌。政府官员想方设法要抗击这种悲惨的境况，当某个土匪被抓入狱后，司法机关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之处决；通常是民众会立即自行处决土匪。

蝗虫的入侵使得原本悲惨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旱灾后留下来的极稀少的东西也被蝗虫吞噬掉。

贾师谊主教为能获得援助，曾向所有能够帮助的机构、团体发出呼吁：传信部、驻北京的意大利大使、宗座代表、位于都林的援助国外意大利传教士的国家协会。它们都捐助了，但只是杯水车薪。于是主教首先建立了一座孤儿院，收留被遗弃的婴儿。并将孤儿交给热心的教友们加以照料，但是主教还是常常想到要让修女们来照顾。

12

贾师谊主教创立若瑟修女会（1914）

贾师谊主教在《25 年传教生活概况 1906-1931》一书中叙述了创立若瑟修女会的历史，此书在 1932 年 3 月发表在修会的杂志《传教画报》上（*Le Missioni Illustrate*），这杂志由 1927 年 1 月开始替代了先前的“信仰与文明”杂志。现在我们将全文引述如下，因为其中阐明了引起主教创立修会的动机：

宗座代牧区南阳府遗留下来的教友中，妇女的数目十分稀少，因此对妇女的福传成了一项艰难的工作，几乎完全不可能接近她们；只要得知传教士们来到了村庄，妇女们都跑得无影无踪，或者躲藏起来，从破房屋虚掩着的门缝里向外窥探。即使是同一家族的教友向她们福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妇女被视为是一件廉价的物品，如果一位传教士关心妇女们，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因此，主教感到非常需要创立一个中国修女的修会，修女们和其他的妇女们并没有两样，他们讲共同的语言、有一样的五官、过着同样的生活；这样，她们才能够开垦这块极其荒芜的园地，慢慢地就能够摧毁那道使妇女远离传教士们的使徒工作，而难以逾越的藩篱。

这件事情是必需的，但也困难重重，因为当时女性教友们太少，受过高深教育的妇女更是凤毛麟角。需要开始一种典范，使那些从未耳闻此事的妇女，能够明了团体生活的重要性，了解构成修会本质生活之神贫、贞洁以及服从三愿的价值。

一位善心人士赠与我第一块为创建修会必要的土地，这样就可以视为修会已经建立。我前往拜访正定教区的文贵宾（*Mons. Jean De Vienne*）主教，他已经组织了贫穷若瑟修

女会，我可以请到两位年老的修女，让她们指导我早期的女性团体。称她们为若瑟修会，是因为她们以大圣若瑟做主保。

为了指导望会生的小团体，正定主教推荐了郝路济亚（Ho Lucia）修女，她是一个成熟的妇女，性情慈祥、善良。贾师谊主教把她请过来，然后将这个由女孩与妇女组成的团体委托给她来培育，这个团体就是贾主教计划成立修会的雏形；她们是孙依捌斯（Suen Agnese）、刘菲罗孟纳（Filomena Liu）、秦加大利纳（Caterina Cin）庄和玛利亚（Maria Zhuang）。

与何修女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位修女，我们却不知道她的名字。随后，从正定又陆续到来了其他的望会生；事实上，在之后几年的名单中，可以找到祖籍是正定宗座代牧区几个修女的名字。

于是，1914年贾师谊主教的修女会正式成立，主教愿意将修会托付在玛利亚的净配圣若瑟的庇护之下，因为他是家庭的主保。人们称呼她们为若瑟会修女，但在神父们之间，通常更乐意称呼她们是“贾师谊主教的若瑟修女”，即使这并不是官方的称呼。

路济亚·何修女的确为她的修女们显示出是一位称职的院长、母亲：她称她们为“小姑娘”，并教导她们爱慕天主、热心救助人灵以及牺牲、刻苦的精神。“小姑娘”这种称呼一直保留着，即使后来修女们已经数目众多并且年龄已经增长了很多，但对于路济亚修女来说她们永远是她的“小姑娘”。她曾这样对她们说：“小姑娘们，你们要表现良好，这样主教就会喜爱你们！”。

这也是路济亚修女不断重复的话语。她做会长达30年之久，直到1944年郟县的山洞中过世；那时日本正侵略中国，为了躲避日本人，她同其他的修女躲避到了山中。

13

修女的培育

贾师谊主教致力于修女的栽培，所以每隔几个月后，就必须再过漂居无定所的传教士生活，因为他持续地视察各地的教友团体。贾主教计划将年轻初学修女的神修生活委托给风来仪神父负责，他坚信她们定能发现风来仪神父是一位非常理想的神师，因此就派望会生团体与初学生团体迁往靠近铁路的城市许州，

因为凤来仪神父就在那里传教；主教这样决定也是担心土匪们，因为他们袭击城镇、抢掠、杀害以及强奸妇女。

襄县不太安全，而在许州，当危险临近时，当地政府官员会将凤来仪神父安置在市内的某个地方，四周都被高大的围墙围绕，并且还有一群士兵加以保护。凤来仪神父也为修女们租赁了一个小地方，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修女们的灵修导师。

八个月后，来自土匪的威胁已经差不多绝迹了，而贾师谊主教在传教中心周围已经修建了一座高大坚固的围墙，这样他的修女们就可以安全地重返到襄县，接受他的直接监护；同时他也不愿放弃善良的凤来仪神父的神修帮助，因此也请凤来仪神父来到他的驻地襄县，这样对修女们的培育工作，就在和谐共融的氛围中进行着，一方面有凤来仪神父认真的灵修培育，另一方面有主教实用的指导。

主教培育修女们将来的使徒工作，曾向她们说：“首先你们要精通天主教教理，学会祈祷，甚至常常向耶稣祈祷，即使在你们工作的时候亦然。我愿意使你们成为真正的女宗徒”。

1916年8月12日首四位修女宣发了修会誓愿，贾师谊主教这样写到：

“我们对于修会的期望实在很多，因为我们对传教区内许多家庭的母亲的培育，都要靠我们的修女们，因此许多家庭的信仰程度以及儿女们的教育也都在于你们。愿天主垂顾并降福这个事业，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传教工作的繁荣昌盛都要倚靠你们了。”

到1918年八位中国修女已经在不同的传教区域开始工作，这说明了传教士们对妇女们所做的指导及教育。

若瑟修女会快速地成长发展，修女们前往各传教地区从事使徒工作，为儿童们讲授教理；特别为留守家中的妇女们讲解要理，探望病人，被派遣到不同的乡镇去解决某些困难，或者平息某种冲突。无论在何处，他们的工作都显得弥足珍贵。几年之后，贾主教将为修女们在郑州修建住所，派几位修女进修治疗眼疾的专科。

她们对传教的忠诚，在各种考验中都显露无遗，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以及在共产党统治下。

1930年，若瑟会修女们已达到34位，其中四位修女被贾师谊主教派往洛阳，帮助新设立的洛阳宗座监牧区创立一个新女修会；而当时的宗座监牧是巴友仁神父，他1935年被任命为宗座监牧。

第二年，也就是 1931 年，是郑州传教工作的第二十五周年，贾师谊主教在《传教画报》杂志上宣布：

郑州的若瑟修女会正在开花结果。这些修女们除了致力于整理并装饰圣堂的工作以外，还两个两个地去帮助传教士们，整年留驻在那里。这样，传教士就可以通过她们在妇女中间展开使徒工作。其中最慰藉人心的，就是有些修女们在年轻力壮的时期，就带着圣德的馨香离开了人世，她们是纯洁的百合花，生长在污秽的教外人中，却出淤泥而不染，她们就是人间的天使，她们赢得了所有认识她们的人的敬仰，是教友以及教外人心目中最崇高的典范。

若瑟修女会在各种考验中艰难地生存着，直到现在（2013 年），仍有超过 30 位修女继续发扬着贾师谊主教第一批修女们的光荣传统。

甜蜜、美妙的惊喜：在 2011 年 10 月 23 日为圣孔维铎主教列圣品大典中，重整若瑟修女会的两位修女莅临于现场。之后，她们前往帕尔玛拜访圣孔维铎主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有她们修会的会祖圣善的贾师谊主教生长的地方。

14

瘟疫、饥饿与战争（1916-1925）

当内部斗争和饥荒刚刚结束，河南西部的宗座代牧贾师谊主教就反省中国的现况：中国有四亿人口，而教友数目少之又少，他在 1912 年的“信仰与文明”杂志上写到：

非常需要彰显传教士们所完成的善工，也需要更多的传教士。我们以极大的诚意希望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如同我们一样拥有信德的宝藏。啊！我多么希望整个意大利都能够听到我的召唤！啊！我要高声呼喊：高贵而伟大的人哪！你们拿出一点时间，想一想使徒工作吧！… 如果你们感到被福传事业所吸引，那么就要相信那是天主召唤你们的呼声；噢！请你们不要让天主的呼声在你们心中白白地回荡。

不久，1915 年的年终报告中，贾师谊主教讲到在宗座代牧区从事传教工作的有 13 位传教士，直到 1914-1918 欧洲战争的结束，传教士们仍然是 13 位。

1916年7月16日一封写给“信仰与文明”杂志读者的信中，贾师谊主教向意大利的教友们呼吁爱德工作，虽然他知道意大利国内战争正在爆发：

我的心在流泪痛哭，因为我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向我要求派遣传道士以及设立学校的请求…。如果这不是我们这些传教士们最伟大、最崇高的奋斗的目标的话，我不敢在意大利目前这么痛苦的境况下请求援助。

然后主教讲论他视察各个教友团体的情况，还有其它各种创建的事业。十年内教友的数目增加了十倍：从开始的800个教友，到现在的7000个。

圣婴孤儿院收留了154个孤儿，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孤儿被委托给国外收养。男传道士有65位，女传道士有18位；这些传道士们管理着61所男子教理学校其中包含997位慕道者，14所女子教理学校，其中包含74位慕道者。在各种统计中，还包括10座中国诊疗所与8座欧洲医药诊疗所。

为那些志愿成为司铎的人建立小修道院，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几年以前，贾师谊主教就已经请一位想成为司铎的年轻人，到汉口的方济各会修院修道，因为在自己的传教区成立修道院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主教创立了自己的教区修道院，虽然规模还属于初期，但也足以容纳10位修道生；开立当地的神职班是贾师谊主教最关心的事情，1930年年底，贾师谊主教已拥有52位修道生，此事他曾在1932年的“信仰与文明”杂志内提及过。

欧洲战争的那个时期（1914-1918），也是停派传教士的时期，同时由于缺乏外国提供的援助，那些已经开展的工作也变得更加艰困。随着战争的结束，希望又再燃起了。

在河南省，1920年是爆发瘟疫、饥荒与战争的一年，贾师谊主教在1921年“信仰与文明”杂志的年度报告中写到：

“我们在这一年受到了许多的考验。如果不是天主的恩宠帮助我们，我们将会屈服于悲痛的重负之下。在许多县城，霍乱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它使很多家庭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其它县城，土匪、强盗无恶不作，他们破坏教堂、偷窃教友的财产、使许多村庄都笼罩在极度的恐慌之中。除了这些悲惨的事情之外，还有内战，战争在宗座代牧区内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痛苦的伤痕，对此我深感无能为力。如果现在天主以饥饿和战争严厉地考验我们，那么天主肯定对我这个贫穷的传教区有着伟大的计划。”

贾师谊主教继续写到：

“我无法讲论这几个月因饥饿所造成的可怕而心碎的场面，因为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只想说，有许多的婴儿被抛弃在枯井里，一些父母吞吃因饥饿而去世的亲生子女的肉，可怜的妈妈怀抱着自己的儿女而死去。政府命令人们贩卖女孩、妇女以及小孩们，就像贩卖任何其它的货物一样 …。仁慈的天主怜悯这成千上万的贫穷中国人，希望教友及教外人当中出现一些慷慨好施的人，从死亡的边缘中拯救这些不幸的人。”

天主教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地援助了这些穷人。在这些援助贫困的工作中，柏长青神父做得最多，因此人们为他立了两座石碑以表彰他的功绩。这也是首次有临近的省份伸出援手，特别是上海市，在紧急时有各种特殊机构收留了几千位从八岁到十五岁的孩童。

贾师谊主教也曾前往洛阳府，因为那里饥荒最严重；主教在那里与柏长青神父共处了四十五天，鼓励柏神父，并且以慈父般的言语安慰那些遭受灾难的家庭们。

而河南省也被许多的不幸弄得人心不宁，天主正在为孔维铎的传教士们准备新的传教士。1921 年 4 月 15 日，艾安康（Giovanni Gazza）神父从帕尔玛出发前往中国。不久，另一小传教士团体也来了。很久不变的数字 13 终于改变了，这是这些年的年度报告中，贾师谊主教一直重复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指出在传教区内传教士们的人数。几个月之后，在 1922 年 5 月，尚德里神父（Antonio Sartori）、马神父（Luigi Magnani）、罗神父（Luigi Rotteglia）及孟济华神父（Eugenio Morazoni），都陆续到达中国。

随同艾安康神父来中国的，还有四位嘉诺撒会修女，她们是第一批来到贾师谊主教传教区的修女，她们来开办女子初中和高中，并且照顾即将创建的医院内的病患。现在我们将四位修女的名字记录如下：会长 Maria Piazzini 姆姆、Isolina Brugnoli 修女、Giuseppina Ghioni 修女及 Mattia Pisano 修女。她们以及那些以后到来的同会修女们管理着一座女子孤儿院、一座女子学院以及各种不同的诊疗所。阚神父（Pietro Garbero）在 1965 年帕尔玛出版的：“沙勿略传教士在中国”杂志上，这样写到：

那些善良的修女们完成了极伟大的使命；她们以崇高的牺牲精神逐户去照顾那些被霍乱以及日本致命武器所伤害的人们。

在郑州，龙高升神父以他的才能与鉴赏力早已为修女们在 600 米的围墙内预

备了一座漂亮的房屋；此外，修女们也拥有了已完工的女子孤儿院，不久，女子学院也相继创立。

此时，针对修会的一件大事使得贾师谊主教开始反省与自己并肩辛劳的同会弟兄们；1921年1月6日罗马教廷批准了修会的会宪，因此需要在母会院开始建立初学院。针对那些未曾做过法定初学的人，修会会祖曾请求了宽免，这样他们就可以宣发终身的誓愿。

修会初期的传教士们，如何看待这问题呢？除了那些在金狮大街或稍后受过培育的修士们以外，其他的人加入修会时已经是司铎或者是神学最后几年，这些人实际上是受传教理念的感召，他们热情地想成为福音传播者，因此对于修会生活了解的非常少；甚至有些人在自己誓愿到期时，竟忘记了重发修会誓愿。现在涉及要将自己完全奉献予修会，有些人会犹豫不决。贾师谊主教列了一个名单：实际上在艾安康神父之前，在中国的传教士只有12位（包括主教则有13位），有6位传教士曾经举棋不定，也许是因为贾主教而不敢确定。好在事情最终都获得解决。

15

宗座代牧区更改驻地与名号（1922）

贾师谊主教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因此决定改变驻地；将龙高升神父在襄县所建立的狭小主教座堂留在当地，而迁址到郑州，因为这城很可能会变成大都市。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07年11月贾师谊主教就派遣凤来仪神父前往郑州传教，凤来仪神父以其热情的传教工作在此城建立了一座传教站；1911年巴友仁神父接替凤来仪神父在郑州的传教工作，而在1913年贾师谊主教又派龙高升神父前往郑州传教；龙高升神父不但使教友的数目增加到900位、新慕道者增到上千位，而且还开始了许多其他的工作。

贾师谊主教于1921年的下半年进驻郑州，并且计划即刻建筑主教座堂，并将这主教座堂以及整个代牧区奉献给耶稣圣心。

主教座堂由龙高升神父设计，而由中国企业家罗百宏资助建造，此人是贾师谊主教的私人朋友，他的绰号是“中国的慈善家”，因为他捐建并援助了无数

的社会工程。

主教座堂长 35 米，宽 13 米，拱顶石的高度为 17 米；圣堂是早期哥德式风格，简单而没有任何的装饰物；堂内有三个中殿。教堂在 1922 年 9 月 16 日被祝圣，第二天上午十点开始举行主教大礼弥撒，在弥撒中歌唱了柏劳兹的“赞主诗”，由范登博格先生与默丽娜陶女士指挥，嘉诺撒会修女们与几位神父则加以咏唱。除了无数的中国教友以外，在郑州外侨区的许多教友也参加了感恩祭；此外，企业家罗百宏也远道从上海来参加礼仪，他是一位卓越的慈善家，就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随着主教座堂的迁移，传教区也因此拥有了新名字：郑州宗座代牧区。

除了主教座堂以外，还建筑了主教住所、一座小型修道院、一座男生学院、嘉诺撒会修女们的住所与女子学院和学校，当时也计划为若瑟修女会创建一座小型会院。

从 1923 年的汇报中我们可以知道，沙勿略传教士们已经增加到两个团体，嘉诺撒会修女有 7 位，若瑟会修女有 24 位；修道生们仍然是 11 位，但在襄县开办了一座备修院拥有 10 位学生。教友有 13322 位，传教区拥有了四座初级学校有 210 位学生、一座高级学校有 50 位学生。外国语学院有 50 位学生、女学生 10 位；慕道者大概 7500 位。

能够获得这些发展的原因，都是因为天主的特别眷顾，虽然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在我们的传教地区发生了内战。随着吴佩孚的战败，其军队都归编了匪军，因而为人们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在 1925 年 3 月，土匪们抢劫了位于偏远西北陕州的住所，安杰罗·毕纳斯基神父被迫逃避到邻近的山西省才幸免于难；土匪们也袭击了禹州的住所，博神父被土匪们持枪追踪。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为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且也阻碍了传教的工作以及对教友的照顾。也是在这些年内，郑州宗座代牧区被冠上了令人遗憾，但却真实的“土匪们的主教”的名号；后来阚神父发表了关于贾师谊主教的传记，就是以此为书的标题。

1925 年的下半年，贾师谊主教写到，土匪们已经从传教地区撤离，这样他自己以及神父们就能够去探望教友们，并给予他们安慰，因为他们在最近的这几年来遭受了许多的痛苦。

很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贾师谊主教在 1926 年 10 月 29 日这样写到：

战争与掠夺已经是地方上的一种常态，更甚的是又有共产党大规模的宣传，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可怕。我们的传教事业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些事情的毒害。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是在 1921 年，他们得到了苏联代表们的援助；在 1925-1926 年与蒋介石将军的国家政党 - 国民党联盟，而蒋介石曾计划向北方推进以获取政权。贾师谊主教让我们明了的是，军阀吴佩孚与张作霖曾是敌人，但是后来为了抗击南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联合在一起；吴佩孚当时就驻军在河南。贾师谊主教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到：

我们就处在各种士兵的侵犯之中，由于军人得到的奖赏很少，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就开始各种勒索和暴力。我们的城市全是一副凄惨的面貌，人们沉静地痛苦活着，没有任何能力脱离这些足以毁灭他们的灾难。

陕州的住所再次被攻击、被抢劫，教友们都四处逃散，有些教友被杀害。在禹州土匪们杀害了看门人与女厨师，博神父遭遇了严重的危险；贾师谊主教建议将他召回意大利，因为他仍然处在惊吓之中。从山西和内蒙古也传来消息说有些传教士们被杀害。

16

经济状况

1926 年 9 月 26 日，贾师谊主教给会祖孔维铎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传教区的经济状况，并且抱怨修会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即使最后到来的传教士们也没有充足的行装。

孔维铎主教在同日也回了一封信，并将信件交托给林蒙席（Dante Battaglierin），因为他要同翟维良修士（Valeriano Germano）出发前往中国。这封信几乎就是对贾师谊主教信件的预先答复，孔维铎主教让贾师谊主教明了，由于志愿传教士们的数目不断地增加，因此维持生计的花费也随之变得更加沉重：

这里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勉强生活，但是上智的天主不会抛弃我们，即使只是点点滴滴，常常会降下及时雨，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维持生活。您不要惊奇未能给您由传信部以及援助传教士国家团体所提供的所有援助物资…，我们贫穷的修会没有能力应付派遣传教士这么庞大的开销。我们被迫扣留了一部分本应该寄往中国的援助物资。我也通过总会所做的解释看出了我们的确需要更节俭来维持生活。

当贾师谊主教收到这封信件后，立刻明白了最后到的传教士们：姜神父（Alessandro Chiarel）、恩神父（Alfeo Emaldi）、穆神父（Antonio Munaretti）以及高神父（Vincenzo Capra）为什么携带了的行李那么少。

当交给林蒙席神父的信件尚未到达之前，又从代牧区寄了一封信件，日期是10月26日；此信是用机器打印的，这说明信件是由贾师谊主教的秘书印的，也说明了信件的正式性。这封信件说明了传教区所处的财务困境，为了准备将来的发展而被迫背负债务，并且埋怨修会没有援助传教区，请求每年将那些指定给传教区的捐款都能够定期地转交。希望从财务的角度，确定修会与传教区的关系。

信件中提到的“为了传教区将来的发展不得不背负债务”，暗指在各地购买土地，包括在自己的传教区以外，这样将来传教士们就可以依靠这些定期租金来生活：就像在意大利已存在的一种教会收入的来源途径。看来是最高权决定机构的一种规定，但是这样使修会的会长在财务管理方面也很困惑。当时正是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这个危机也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修会也努力地在普遍存在的危机中求生存。

1926年12月20日，孔维铎主教做了这样的答复：

看到您10月26日的来信，且知晓您的代牧区所处的严重困境以及我们的修会对此传教区所应承担的义务，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所能带给我的苦痛！我们常常将这些职责放置在眼前，并且决定，只要一有可能，就会立即满足这些义务…。

再次叙述了修会为能维持志愿传教士的生活，需要付出沉重的开支之后，孔维铎主教宣布已经将勉强从银行获得的款项寄往传教区，以偿还所负的债务，由匿名的社团机构给予担保，并以修会的母院作抵押。款项的数额是150000里拉，是在1927年1月的最后几天或是2月的初以电汇汇票邮寄出的。

为能明了这个操作方式，需要明白当时的情况：教会在意大利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为能合法地拥有教会财产，需要所设立的股份社团做担保，然后需要修

会与传教区之间所达成的暂时解决办法的一封建议信。

事实上，意大利的财政状况已经为银行造成了危机，因此当孔维铎主教请求经济援助时，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出借；当孔维铎主教最终获得所要求的款项时，还需要完成其它的手续，才可以将款项寄往海外。

这种贫穷人之间的争执，即使双方都言词谨慎、措词严谨，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17

布尔什维克飓风

清朝覆灭之后，1916年至1920年之间，在河南地区发生了四起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战争。只要一个省宣布独立，立刻就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将其推翻。这样类似的战争发生了四次。最后一次战争正好赶上布尔什维克飓风袭击。

有一段时期，共产党曾经是蒋介石的盟友，但最后遭到蒋介石的攻击，有些地方甚至遭到彻底的灭绝。因此，他们离开了北方和沿海城市，集中在南部省份。

与此同时，一些领导开始占领中北部的一些省份，想从这里开始重新获胜。1926年，有不少南方的共产党军队来到河南。起初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之后，他们沿路以美好的承诺为诱饵不断征兵。他们每到一处，除了以军队的姿态出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群可怜的人，没有衣服穿，他们只寻求美好的未来；但由于无纪律，让百姓觉得更加恐怖。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郑州。捍卫自己土地的北方人想撤退，南方的游击队进入城内。主教当时已经把嘉诺撒修女们安置在山上；与她们一起躲到山上的还有几位年轻的神父和患病的神父。

传教士们的住所被占领，主教把若瑟会修女们，耶稣圣婴孤儿院的孤儿们和慕道者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主教和剩下的少数几位神父都撤离到主教住所的一个小房间里。

士兵们在主教座堂召开会议。有一天，所有人都听到有很高的声音喊说“教会的战争！”之后连续五次都重复说：“处死欧洲人！”。

姜神父在1927年9月的《传教画报》中写到：

我的天主，求祢给我一双可以痛哭的眼睛！现在只有这种方式能使我迷失的心灵找到一

点安慰。在天主的家里只有凄凉。其它的东西都被掀翻，圣像遭到军队的嘲笑，祭衣被装进又脏又臭的垃圾箱里，到处乱堆，有的被撕成了碎块。

主教在 1922 年 2 月的《传教画报》中自述到：

共产党追随着帝国之路，在农村偏僻的地方进行活动。败坏和愚昧的思想蒙蔽了各个阶层的人，他们在广场，学校，旅馆，甚至在我们的教堂内宣讲对教会和神父们的仇恨。宗教被贬为国家的危险品。我们也亲耳听到亵渎神明的呼喊：“打倒宗教！”，这声音回荡在我们的主教座堂前；我们看着祭台被拆除，圣人台像被残酷地打掉肢体，祭衣，圣器被毁，或做为非宗教用途。

在那个时期，贾主教处于一种“随时都会面临死亡的危险中”。这是他在叙述事情发生经过时用的原话。当郑州被入侵之后，主教为修女们和可怜的孤儿们保留了一块地方。这样的动作被视为是对地方领导的反对，他用手枪指着主教的头予以威胁。主教平静地回答说：“如果我害怕死亡，就不会来中国传教了”。士兵神色不安地诅咒了一句，然后离开了。

之后，平静了一段时间。飓风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除了死亡和受伤，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思想变化。

1927 年一场可悲的事件结束了这段动乱的时期：那就是土匪代替了军队。我们当中的三位神父被捕，被带到山里。他们要求一笔非常高的赎金，人们担心他们会成为土匪残酷行为的牺牲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就在那年的圣诞节突然被释放了。因为扣留神父们的土匪头子很喜欢贾教送给他的礼物。

18

会祖的到访（1928 年）

国共联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1927 年年初，蒋介石在上海杀害了共产党的公会领导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成立了新的政府，首都设在南京。

河南地区处于平稳时期，贾师谊主教决定去不同的地方拜访传教士们，并安慰受苦的教友。从 1927 年 11 月中旬开始，直到第二年的三月初，连续四个月都在外面探望教友和传教士们。

欧洲战争时期，在中国的传教士数目一直都是 13 位，后来增加到 22 位，此

外，经过一段漫长的培育，终于看到了成果，主教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自己的传教区祝圣了第一位神父 - 李若望，这是 1927 年 2 月 6 日主显节，在郑州主教座堂祝圣的，有很多的教友参加的祝圣典礼。希望之光还展现在修院的果实上，大修院收录了 7 位修生（高中神学生），小修院收录了 9 位（初中和高中生），另外还有 16 名在修院体验生活的备修生。

由于此段时间比较平静，贾师谊主教告诉会祖孔维铎总主教，这是来中国视察的最好时机。

孔维铎总主教于 1928 年 9 月 21 日乘船从马赛港出发，10 月 26 到达上海。当贾师谊主教还在巩县的山区视察教务时，他接到了总主教到达上海的消息。他骑马来到火车站，上了经过那里的第一列火车，那是一列装载着煤炭的货车。他上了其中一节车厢，与许多穷人一起坐在煤炭上。贾主教来到寒冷的郑州，全身沾满了煤，就像一个扫烟囱的黑扫帚。

洗漱更衣之后，又乘火车到了上海。没有人能够形容主教当时和会祖相遇时的那种感动的场面！

会祖看到他的这个十六年没见的最亲爱的会士，自从 1912 年他被祝圣为主教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他看到他憔悴的面容，那是由于辛劳，缺乏营养，以及常期的战争，抢劫，饥荒和迫害中，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而造成的。但因着他的传教士和教友们热情的接待，以及他们生活的见证，会祖觉得非常的安慰。不只是他的会士和教友们，他在中国也受到地方官员和教廷驻中国大使刚恒毅总主教的热情款待，刚恒毅总主教在会祖眼中是一位圣人。

会祖在 1919 年就由宗座中国传教区视察员，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葛布利亚 Guébriant 蒙席那里，听到有关中国教会的见证，Guébriant 蒙席在 12 月 16 日写到：

我和贾师谊主教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我也参观了不少他的传教站。我迫不及待地向主教您报告，我在这次的视察中所经历的美好感受。在委托给你们修会管理的传教区内，透过真正的传教士贾主教的带领，他具有传教士所需具备的传教活力，热情，和谐，智慧和慷慨。希望你们继续派遣像他这样的传教士来中国，天主的国将会在这个世界上飞速的发展。我钦佩他们的贫穷精神。虽然贫穷阻挡了它们的发展，但成熟收割的时候还是快到了。

孔维铎会祖和贾师谊主教一起乘火车来到郑州，那里已经有传教士和很多的教友在等待他们的到来。

孔维铎会祖在传教区停留了一个多月，他拜访了不同的教友团体，与他的每一位传教士都单独的交谈。

他曾计划任命一位修会的会长，希望与地方教区的会长的责任区分开来，最后由文唤有神父担任此职务。因为有几个修士承诺要修道，他便决定要为他们成立修会的初学院，但后来由于青年们的意向不稳定，事情就没有结果。然而，他的确做到了以慈父的身份鼓励同会的弟兄们，关于这一点，没有人不钦佩他的虔诚，坚贞，以及他美好的精神。

在登上穿越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开往欧洲的火车之前，孔维铎主教感觉自己有必要给他的会士郑州的贾主教最后的问候，他在 1928 年 10 月 14 日这样写到：

我在你的代牧区逗留的这段时间，特别受到中国人友好的款待与热心的帮助，对于这份恩赐我永怀感恩，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这份感激之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恩赐，就像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我所钦佩的圣德楷模一样。最尊敬的贾主教，真心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会祖于同年 12 月底回到意大利，他对这次的视察非常满意，也对中国教友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给他的会士们说：“我看到了一片结实累累的天地。”

19

一个不愉快的插曲

贾师谊主教在 1904 年去中国之前，同行会士一致推选他为他们的会长；他被任命为宗座监牧之后，同时身兼两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被选为副会长。从教会法的角度来看，一人不能同时拥有两种权力，然而由于当时的团体人数少…，再者可能也没有人去考虑法典的规定，人们只是单纯地把他当做自己的会长。

1921 年，当修会被教廷正式肯定之后，人们才开始考虑法典的问题。我们无法知道总会长是否为了任命贾师谊主教为中国的会长而撰写过一个派遣令。但是即使没有这个政令，大家都公认贾师谊主教是修会在中国的会长。当时会规已经开始实行，其中规定修会的会长任期是三年，之后可以连任三年，如果再

要继续任职，需要教廷的批准。

孔维铎主教回忆说，1926年10月贾师谊主教第二个三年任期届满时，他和传信部的枢机主教 Van Rossum 谈过此事。关于连任这事，并没谈到是否允许。但提到传信部的规定，若在同一个人身上有双重权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1926年10月22日孔维铎主教在信中把这些问题写给贾师谊主教。

贾师谊主教很快回信说，起初，传教士少的时候，他反对权力的区分，但现在传教士增多了，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都已接受了良好的修会培育，现在有必要将权力区分开来。他在1926年12月15日的信中说，修会的会长应该是一个能够在德行、知识和年龄上都能影响会士的人，“而且这人应该是一个能承担起副主教职务的人。”这一条文虽然没写在会规里，但它是宗座代牧的心愿，因为这样处理事情会比较顺利。

当时也没有其它办法，传信部就批准了第二个三年的任期。但不能再有第三个三年，所以会祖来中国做牧灵访察时，也有意任命修会新的会长。

会祖与会士们商量之后，决定选出新的会长。但有两三位常在贾主教身边，像是他的参议的会士不同意，他们希望（后来在信中也确实是这样写的）会祖把他们看作是教区参议会成员，会考虑他们的意见。但会祖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后来，这些会士就把所有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整理好寄给会祖。贾师谊主教也同意了，并在上面签了字，但他不知道这次邮寄除了数据，还有一封信，他也签了名。但他说他不知道信中有对总会长的一些指责及会士们带有争议的评论，其中一条说，会祖的牧灵视察并没有什么效果。

孔维铎主教感到很难过，给宗座代牧写信，埋怨他们为何在信里表达对总会长的不信任。贾师谊主教立即回信表示道歉，而会祖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好几年以后，还有会士听到贾师谊主教问道：“他们到底让我签的是什么呢...”

在传教区做事，可能不会事事谨慎做得好，长上也信任属下，但孔维铎主教虽然已经做了七年的总会长，但还是无法接受一位主教在没有阅读的情况下，在一封信上签名，或者，阅读了，但没有注意到是那样负面的内容。孔维铎主教并没有因为这事而减少对贾主教的爱护，但是谴责了贾主教，说他需要有一个更严谨的管理方法。

新的成就和事业 郑州医院的扩建（1929-1930）

1929年12月21日，贾师谊主教祝圣第二位中国神父。他叫张伯多禄，生于襄县。贾师谊主教赏识这个优秀要理员的忠贞和热忱，他也非常渴望晋升神父。他跟几位神父学习了必要的神学知识。

1930年6月20日，主教祝圣了另外两位神父：张多玛斯和孙若瑟。他们两个在德行和热心上很突出，也学习了规定的课程。1931年又有三位修士接受祝圣，直到1944年贾师谊主教去世时，已经有11位神父。

河南省是国民党将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曾有一段时间，社会相对安定，之后与中央政府冲突，冯玉祥将军被政府军打败，他带领军队退到山西。随着他的离开，河南省又落到土匪掌控中。

虽然有这么多困难，1928至1930年间，在郑州主教座堂周围，兴办了不少事业。

主教想要在较多富人居住的城市的中心，开办一个幼儿园，这是一项新的事业，其结果很成功。在那里服务的嘉诺撒会修女很能干，得到了人们的赞赏，第一年就有108个学生。

同时，青年人的学校也很有生气，拥有200名学生。但是，由于军人的敌视和对文物的破坏，学校被迫关闭，他们为了开会侵占了学校，毁坏了桌椅，弄脏了墙壁。

他们认为传教士只顾传教而不考虑人们的利益，为了响应对传教士的误解，主教觉得需要开展慈善事业。因为慈善事业才是基督宗教的最好的果实。主教同意开办一所医院，并为穷人开设诊所，医院是从1912年所建的简陋诊所扩建的，贾主教也就是在这一年被祝圣为主教。

诊所很快开始给予需要的人直接的救助。每天需要医疗照顾的有数百人，这种服务受到人们的赞扬。人们来到这里，不仅仅因为医药免费，更是因为他们被救助和接待的方式。医院的服务不仅得到了教友的赞赏，也受到教外人的认同。尤其几个出乎人预料的痊愈让当局感到吃惊，于是，他们派人调查医院的治疗方式，想要知道是否存在奇迹性的治疗。也许真正让病人得到痊愈的正是服务人员的奉献精神 and 关爱。

几个受伤的士兵从原来的医院转到传教士的诊所。还有几次，当局使载有伤员的火车在传教士的诊所停下来，为的是让传教士治好他们，然后再出发。

贾师谊主教在 1932 年的“辉煌的传教事业”杂志里，写下了他在传教区 25 周年的报告，他这样说：

让人惊喜的是，几天前还撞传教士的家门，打家劫舍的士兵们，现在是如何看重教会和在诊所服务的嘉诺撒会修女们。

有一天，在诊所的大门上贴出了三张写着金色字的布告，其中表扬教友的品德是“降落在大地上的露珠”。

光是 1930 年，医院就治疗了 147,000 个病人，其中 37,000 位是士兵。传教士和修女们也很高兴地给几个临终者施洗。1930 年，给临终者施洗人数达到 300 人¹。

贾主教还说，在这些成功事业的背后，也有很多的辛酸，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也作了很大的牺牲。不少善心人士，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做了很多的奉献。

在主教传教 25 周年的报告上，也强调了传教工作。主教追忆了传教初期分布在广阔土地上的 700 名教友。他曾经看到过由于家人的为难而受伤的教友，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接受了洗礼而被逐出家门。

主教和传教士们清楚地明白，让整个家庭接受洗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样能够加强他们的热忱和努力。这一愿望在几年之后逐渐实现了，他很欣慰地看到不少的家庭接受了福音，成为教友的家庭。

21

主教和传教士

在这里我们述说贾师谊主教和他的传教士们的关系。这需要追溯 4 位传教士来中国的准备期间，即 1904 年 1 月 17 日，修会的会祖孔维铎总主教把他们召

¹ 2012 年義大利心病科醫生方濟納卡來拉被邀請到鄭州，參加 7 月 27 日舉行的當地大醫院 - 人民醫院成立 100 周年紀念活動。他很吃驚地看到，人們不僅記得該醫院的創辦人 - 義大利籍主教賈師誼，還掛出了他的照片，並在旁邊寫著，該醫院當初是為了窮人和所有那些需要醫治的人而創辦的，所以，賈師誼主教應該被稱為該市的功臣。在 www.eurochinahealth.com 網頁上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集到他的房间，以慈父的口吻叮嘱他们，鼓励他们怀着热忱、勇气和恒心把自己奉献给使徒工作，就是上主在中国河南为他们准备的工作。

主教在给他们送行时说：“我本来应该给你们指定一个会长，但是这由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们认为某个弟兄适合担任这个任务，你们就秘密投票给他，到最后我会认可你们的决定”。

贾师谊神父被选上了，他获得了三票，他自己投的那一张票当然是为别人的。这正是孔维铎总主教想要看到的结果，他微笑着宣读了投票的结果。

卜懋德神父解释说：

“不可能是别人。因为所有人都拥护他、喜爱他，他那有节制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让人佩服，脸上总是带有微笑，他是天生的会长，从我们相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根据会祖的叙述，随着他成为宗座代牧，贾师谊神父“放弃弟兄的身份，好使自己像父亲一样工作。”

贾师谊神父是真正的父亲，对传教士是这样，对他负责的教友也是如此。

他的传教士们！每一位传教士都像他一样，经历了与自己的家人和国家离别的痛苦。他曾经历过艰难的生活、住过简陋的土房、体验过传教行程中食物的短缺，因为有时要走十五到二十天，有时一个月，还得在野外露宿，吃穷苦人施舍的一点食物；他感到过劳累，也有灰心的时候，但他每次都能热情地款待那些来主教公署的传教士们。他经常给那些在遥远和困难地区传教的弟兄们以惊喜。他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也特别爱戴他们，而传教士们也能感受到被爱。用主教的话说，他们时刻准备好面对一切的困难和危险。

他从不发号施令，虽然他知道不会有人拒绝他的命令，但他只是建议性的和征求性的分配工作。他尊重每一个人，为了表达他对弟兄们的信赖，有时他也邀请他们为他做一些服务，可以显得他们比他更有能力。他的信任使传教士们也很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因为他们的上司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勇气。

当某个传教士带着自己传教的计划来到他那里，期待从他那里听到鼓励的话语，他会说：

很好，很好，继续工作吧。

或说，

是的，当然啦，但是也可以这样或那样。

他的建议很不错，以至于传教士都乐意接受。当传教士的建议好像不太理想的时候，他不会直接拒绝，而是很客气地说：是一个好主意，但是需要多考虑

考虑。

为了让弟兄们感到满足，他会拿起笔记本，把他们的建议都写下来。他从来不会忘记，有时在事情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是他主动重新提出话题，对所有的建议加以讨论，并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使得传教士们获得更多的动力。

这些传教士的建议不见得都做得得到，但他都不直接拒绝，会婉转的回答说：“最好再考虑一下....”

危险的时刻也常有，在危险时刻续留在原地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他会鼓励刚来的弟兄，以及那些身体弱的弟兄离开危险，同时他会说：“我自己留下来，如果还有谁愿意也可以和我一起留下”。

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十分痛苦，那就是总会长要求某个弟兄回意大利。他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考虑到修会的需要，因此他没有抱怨，只是劝另外一个弟兄担任起这位弟兄的工作。如果有弟兄去世，他的感受就像失去儿子一样痛苦。

他在离住宅不远处建造了一个墓地，当有弟兄从总会来时，他常常和他一起散步到墓地，并一起为亡者弟兄祈祷。

他与年轻传教士走的很近，以便鼓励他们，好使他们不至于在最初的困难中失望。他也特别关心那些工作狂的人，他会及时制止，因为他知道过度的工作会让人窒息。

那些 1920 年卜懋德会长在任期间，和后来进入初学的小弟兄们，他们都是成熟的青年，但也受到了不少考验，他们具有学生和年轻司铎应有的能力。他们在总会的院子里设计了一台有很长天线的原始收音机，在当时收音机还不流行，人们只能在实验室看到它。后来，他们又制作了一部在北美印第安人地区传教的电影“火焰”，尽管在技术操作方面不够完美，但是由于特别感人而吸引了年轻人和成年人。

孔维铎总主教告诫凤来神父说：“神父，记住，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理解和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与十五年前的迥然不同”²。他们是新时代的年轻人，在服从指挥和实施职务方面更自由、负责、独立。即使观点不同，甚至得不到他人的认同，但他们的服从都是无条件的、慷慨的，这种服从的精神对他们的选择是有益的。

在中国，有些老的传教士会带着怀疑的目光看那些年轻的传教士们。有一次贾主教本人对他们不正经的轻忽态度也很不满意。但是经过与传教士们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发现年轻传教士们很有节制，面对逆境也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² 参阅 Augusto Luca 著，Pietro Uccelli uomo di Dio 一书，第 125 页，2005 年 CSAM, Brescia 出版。

主教很乐意和他的传教士们在一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他们谈话，分享他们的喜乐，也不会因为他们的玩笑而心生疑虑。有人抱怨时就安慰他，他记得香港主教的话：“为了不成为真正的疯子，在传教事业上需要变得疯狂一点...。”

夏天炎热的时候，他经常说：“活着就该满足！”

他高兴地接纳来自内地的每一位传教士，并交给他们工作：给若瑟会修女简单的讲道、教教圣婴孤儿院的孩子们、或者做他自己的秘书，用打字机抄写重要的信件或者文件。传教士们给他带来的喜乐，使他在沉重繁忙的工作中感到轻松愉快。

22

宠爱的对象

这一节的内容是来自阚神父所写的：“中国人成为宗座代牧宠爱的对象，他们是他的世界、他的一切”。

传教士们就像他的家人，教友也像他的家人。他的门为所有人敞开着，很多时候教友都是不敲门就进去了，但他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们，尤其是那些从远道而来的人。他以真诚的爱对待他们，他甚至很清楚地认识他们每一位。

此外，他也主动与不同地区的教友接触。很多次他甚至很有耐心地翻阅传教士的堂区牧灵记录。有时他也会给出一些建议，比如：这个人有作教友团体负责人的天赋；或者，那个女人为了成为教友受了很多苦，需要多给与鼓励。

他所坚持的观念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让整个家庭接受洗礼。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妻子不愿意认识教会，当丈夫和孩子们祈祷的时候，她认为他们是在制造噪音。有一种现象很奇怪，那就是：妻子或者丈夫往往为了让家庭和睦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有一天，一位丈夫来到传教士那里，说他的妻子讲奇怪的语言；传教士赶到后发现她附魔了，于是就行了驱魔礼，从此以后这位妻子变得很安静，后来也领洗进教了。

贾师谊主教从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对中国人怀着极大的好感。一段时间过后，他了解了他们的好品行，并对这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既聪明又勤劳，他特别欣赏中国人的耐心。家里的女主人虽然总是做同样的

饭菜，无论她做的怎么样，人们都吃的津津有味；人们睡土炕，枕砖块，盖破旧被子，被子的颜色通常都是栗色的，因为比较耐脏。耕种土地，生活舒适满意，从不抱怨。他们的宿命论有助于帮助克服各种灾祸。

他们讲话的时候总是引用谚语，说明他们很有智慧。

不但上层社会的人都遵从孔子的教导，这是一位生活在基督降生前 500 年的智者，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受教于孔子的学说。孔子留下了一些著作，教导人们生活的意义，重视和谐，效法天道，即是说宇宙被宇宙的法律支撑着，并且这个法律控制宇宙中的一切。所有人都应该尊崇皇帝和任何一个有责任领导社会的人。在家中，人们则应该服从和尊敬父亲。

在中国人身上，贾师谊主教发现中国人对友谊的重视，孔子将它称之为‘仁’，即：友爱，慈悲，同情。其它的德行有‘忠’。

中国人之间在有需要时他们总是相互帮助。大家也都有博爱的精神，孔子称之为“仁”，即：友爱，慈悲，同情。贾主教在人民身上还发现了其它的德行，这些也是孔子的教导，其中包括：“忠”，“恕”。关于恕，和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不愿意人对你做的，你也不要给人做’是一样的道理。

孔子没有谈到“神”，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来自于老子的道教和佛教。

对于老子而言，有一个超凡的原则存在，它就是“道”，从它发出人的伦理原则。

佛教讲说，佛是慈悲的，要求同情和善的行为。佛教在中国很普遍，其中的一些思想对基督信仰有帮助，它可以让人在基督内认识真正的救世主，他是仁慈的，他爱世界，甚至为它而舍弃自己的性命。

23

教区会议（1930）

1930 年最后的一件大事，是举行首届教区性会议。那次会议曾一度往后推迟，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就算付出全部代价也要举行。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开第一轮会议，太阳下山之后再开一轮，这样安排开会时间是为了避开每天飞过两次轰炸城市的飞机的打扰，那是将军之间的内部斗争，可能是因为一个将军占领了该省，而政府军在和他交战。

教区会议是主教和司铎们的聚会，为了讨论教区的情况，并制定出行动指南。郑州的教区会议以中国主教会议为指南，这次主教会议是 1924 年在上海由刚恒

毅主教召开的。在主教会议中，人们可以看到刚恒毅主教的传教神火。

下面我们简述几个关于传教的讨论结果，它们在艾安康神父所写的“征服者”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关于传教方法，教区会议这样说：

福传虽然是天主的工程，但我们也有义务，尤其需要通过用圣善的生活来见证。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爱，对待托付给我们的人民，尽管每人都有缺陷，但也要怀着忍耐与和善对待他们。为了拯救他们，我们需要忍受各种患难和挫折。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宣讲，但是为了使它成为有效的，需要不断的恒心祈祷，同时也应该劝告教友们为外教人的皈依而祈祷。我们不能等机会宣讲，而应该去寻找机会，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去探望教友们的时候都需要宣讲。劝说教友们成为传教士，向亲戚，朋友们传教，教导信友们怀着教友爱德的精神去进行传教工作。

关于慕道和慕道者，会议这样说：

根据规定，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教会，表示愿意进入教会，并把家中迷信的东西清除，有好名声和纯正的意向的外教人，才是望教者。

如果是整个家庭，从家中除去所有迷信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应该知道，信仰耶稣基督意味着给自己的人生找出新的方向。

如果在某个地方有更多的家庭渴望信仰耶稣，尽量给他们派去一个中国修女或要理讲师，如果能开办一所小的传教学堂就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应该常常探望那个团体，密切关心团体的进展。

慕道期是学习信仰真理的时期，应该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那里望教者们聚在一起学习一两个月。这次会议还认为，望教者在传教士的家聚会是有利的，因为传教士能够亲自教导望教者，还能够一一认识他们。望教者的团体人数不该太多，他们最好在自己家中已经学会了 6 端经文。每个团体学习一个月，如果传教士们认真地教导他们，这样为准备领洗就已经足够了。

主教在传教 25 周年的报告中说：

我还有不少的困难和忧伤需要面对，但是我们的牺牲一定会得到赏报。因为一切来自天主的事情都是神圣的，这个想法可以鼓励我们不怕付出一切代价地进行下去。

紧张工作的年代（1931-1937）

1931 年，不仅是传教 25 周年，也是贾师谊主教作为主教到罗马述职的一年。在职的主教应该每 10 年觐见一次教宗。贾师谊主教于 1931 年 9 月 25 日从郑州出发。见到了教宗，把传教 25 周年的报告呈上之后，主教返回修会的母院，见到了修会会祖和他的几位传教士。然后就去不同的地方募款寻找传教经费。从教宗到传信部，再到协助意大利传教士的善会，很多人都帮助了他。意大利政府和其他主教们也协助了他。

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修会会祖病重去世，贾师谊主教感到很难过，为他举行了葬礼，他也看到了人们的哀痛，因为他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位圣人。

之后，为了参加帕尔玛外方传教会的全体代表大会，主教又在意大利停留了数月，在该大会中，选出了会祖的继位人。离开教区将近两年之后，主教返回中国，身体颇为强健，心中总是充满热火和计划。和他一起来中国的有 8 位沙勿略会士，他们的目的地是河南省。

那些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共产党在 1929 年退到了江西省南部，但是国民党继续追赶他们，对他们进行剿杀。当蒋介石动用百万大军进行第五次剿杀时，共产党进行了战略上的后退。把军队从江西转移到陕西北部，穿越湖南和四川。就是在大山里的长征，穿山越岭，沿路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长征的队伍最后到达陕西，只剩下 30000 人。在这里，共产党组成了一个独立共和国，他们为了未来的胜利团结一致。后来与国民党一起抵抗日本侵略。

1937 年，贾师谊主教和他的传教士以及主教府的教友一起庆祝晋牧 25 周年，6 月 20 日是郑州主教座堂的主保节日，来参礼的人数超过人们的预料。很多的人不能进到教堂，他们就站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参与活动。传信部的枢机出席了庆典，并发表了讲话。在午饭的期间，也有几个人表达了他们对主教的赞赏和爱戴。我们在此只分享樊异才神父（Mario Feassinetti）所写“1937 年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中的几句话，选自沙勿略会在中国的杂志：

尊敬的主教，25 年前，教会没有给你一个宝座，而是马车，一辆破旧的马车。尊敬的主教，您拥有一颗年轻的心、一个强壮的身体，开始艰辛地拉动那辆马车，25 年来您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厄，忠贞到底，在您旁边，每个人拉着绳子和您一起拉车，其中也有传教士们。经过 25 年的共同工作和生活之后，所有的传教士：老人、亡者、青年、返回祖国的，今天都在此见证您总是吃苦在前，牺牲在前，工作在前，舍弃自我在前，休息在后的精神。

您总是那么的善良、阳光、平静、热情，从不败兴，毫无自私，在纠正和鼓励人们时，从不用强硬的态度。这些传教士们的见证是您 25 周年的纪念品，最美丽和圣洁的纪念品，是真真实实的纪念品。时间和恶劣环境都不会摧毁的纪念品。

很遗憾，短暂的胜利就像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一样，耶稣后来为了该城未来的命运而哭泣，并开始了自己的苦难。贾师谊主教从此也开始了加尔瓦略山的苦路。

25

黑暗时刻（1937-1942）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自 7 月到 12 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的土地，其中包括北平（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地。

日本人所到之处都发生了恐怖和死亡事件。一年后，先侵占了北部的省份，进而入侵中原。

日本军队在占领一座城市之前，先进行轰炸。从 1938 年 2 月 14 日，开始轰炸郑州，造成了无数的伤亡。3 月 18 日，第一个炸弹落到了传教士们的院子里。造成两个小孩的死亡，他们当时是被压在废墟之下而死的，另外还有 12 个人受伤。

5 月 13 日，有 10 个炸弹落在主教府和主教座堂。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圣堂遭到了破坏。贾师谊主教怀着悲痛的心情首先感谢天主，因为没有人受伤。像这样的轰炸很容易造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人受伤。他举目向天说：「物质的教堂被炸毁了，但是精神的教堂仍然存在，并且会永远存在。」他很快

就开始策划怎么样重建一座大殿，而不只是教堂，一座献给耶稣圣心的大殿，因为他要把它重建得更宏伟，更漂亮。

日本人来到了黄河一带，轰炸河南省会开封。黄河一带的人，看到日本军队几乎没毫无阻碍地前进，开始逃向南部和西部。逃难的人群来到了郑州和河南西部山区。

不久，大批的逃难者到了郑州，他们的情况非常可怜。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军的前进，命令轰炸开封一带的黄河堤坝。河水涌流而下，席卷一切。房子被卷走了，上万人淹死。

在郑州唯一的一所能够救人的医院是教会开办的。每次轰炸之后，数百个伤员拥挤而来。神父、修女和护士们，以及教友们开始紧张地医治，累得他们几乎无法站立，但是仍然继续不停，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贾师谊主教像天使一样接近每个人，安慰他们。

一位嘉诺撒会修女为了通行证的问题而开始发狂：因为中国军官拒绝给她发放去上海住院治疗的通行证。最后只能选择一条遥远而危险的路。这是军人敌视传教士的第一个征兆。

之后，他们开始指责传教士，把他们视为间谍。指责的原因是因为传教士们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与日本是联盟关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贾师谊主教预言。

1942年5月6日，最后的审判到了，所有传教士聚集到河南南部内乡县的一座塔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就像恶狼进入羊群的时候，善牧被迫舍弃自己的羊群的痛苦。贾师谊主教在自己心中默默感谢天主，因为在天主启示下，他为了传教事业而培养了一些中国神父。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有十二位，他们能够替代离开的意大利传教士。

的确，日本军队是踏着人们的鲜血前进的，他们非常残忍，特别是对年轻的若瑟会修女们。在不同地方建立起来的医院和急救中心发生了很多事。幸运的是，政府的新规定是那些主导社会工作的人员可以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如此，主教不仅让中国神父，也让几个外籍传教士留了下来。

6月2日，在警察押送下，贾主教和传教士们坐着人力车开始撤离，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走了400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当时在阴凉处的温度都达到了40度。

就这样走了15天的路程之后，他们到内乡，在一座破塔住下。塔没有门窗，房顶也漏水，他们只能把稻草铺在地上当床。当地人说没有准备食物，每个犯

人应该自己寻找食物，“因为这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集中营”。

。

26

强健的身体被摧毁（1942-1944）

5 个月过后，集中营的生活让贾师谊主教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于是他申请回到自己的医院接受诊治。但后来被批准去许州的基督教医院治疗，而不是天主教的医院，在天主教的医院里只留下了吉神父（Mario Ghezzi）和苏礼安（Zulian）神父。

贾主教在襄县的短暂停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卡神父（Castelli）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1942 年 10 月 3 日，大家在欢呼和鞭炮声中接待主教，他穿着主教礼服来到教堂诵念赞主诗。然后主教开始讲话，由于激动和疲劳，他的讲话数次中断。他说：“我来到你们这里已有 40 年了，你们知道我很喜欢你们……最近几个月我去了几百里以外的地方，虽然离你们比较远，但是我的心……我的心……”。他无法继续再说下去了。为了能支撑住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握着令牌，他的身体向前弯，脸色苍白，同时，眼泪大量的往外流。主教哭泣，中国神父们也跟着哭，修女们，教友们也都一起哭泣。

稍微平息之后他又慢慢开始讲话，但是谁也听不见他讲什么；最后，人们终于听见他用帕尔玛方言大声讲了一句无奈的家乡方言，然后轻松地吸了一口气。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警卫看到主教外出向人们问候。他们认为他痊愈了，想要让他去内乡县。但后来他们推迟了主教出发的日期，让其他神父们都离开了。从 1943 年 1 月开始，主教住在许州。

11 个月过后，也就是 11 月份，他有幸能遇到苏礼安神父和桑修士（Amedeo Sansoni），他们回来是为了在医院做手术。数日后，薄神父（Gino Botton）也回来了，他是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的。

在此同时，日本军队越来越近。1944 年 4 月，警卫通知主教离开许州，因为日本军快进城了。贾师谊主教召集若瑟会修女，和她们一起逃往山区，在郟县的山洞避难。几天后，收到苏礼安神父的一封信，信中告知薄神父不幸去世的消息。大略的经过是，当日本士兵来到时，薄神父从避难室出来，这表明在地

下室有人。当时正好有一个士兵也到了入口处，他的刺刀突然击中了神父的肚子。薄神父不久就去世了。

贾主教又一次感到极度悲伤。大声说：“他是殉道者，他为了救别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数日之后，主教返回郑州自己的住处，他孤身一人，有病在身。1944 年 9 月 26 日，给郟县山洞的逃难者写了一封信：“我来这里 15 天了，我有些炎症，小便困难。难以入睡，发烧 39 度。我感到难以呼吸，身体虚弱。”

出乎人预料的是柯神父（Gisberto Cocconcelli）能够陪伴在他身边。1944 年 10 月 2 日，日本巡逻队闯入了郟县的山洞，那里有我们的几位传教士和修女。他们让成安德神父回到自己的传教区，让柯神父、嘉诺撒会修女和若瑟会修女回到郑州。

10 月 6 日，他去找一位日本医生看病。医生虽然听不懂他所说的，但是通过脸部表情知道自己的病情并不乐观。而他自己还每天都去看望病人。

11 日，他去找另外一位讲英语的医生。医生清楚地告诉他，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16 日，他被诊断出腹膜炎。21 日领受傅油圣事。他头脑很清楚，但是不能说话。在承受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煎熬之后，于 10 月 27 日 10 点 25 分去世。在郑州和他一起传教的传教士、嘉诺撒会修女、若瑟会修女和无数的教友都陪在他身边。

伟大的主教去世了！他离开了人世，离去时和他生前一样，在信德的支撑下，一直保持着谦虚和平静。

殡葬那天，人们哭个不停，给他献追思弥撒的教友们很多，由于献仪太多，需要转送到其他传教士手中，好使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完。

27

一位由天主派遣来的人（1906-1944）

想到贾师谊主教，就会让我们想到洗者若翰，一位由天主派遣来，向人们宣告默西亚到来的人（若 1,6）。就像若翰一样，贾师谊主教宣讲天主子耶稣，说：你们不认识的那位，我连给他解鞋带子都不配（若 1,26-27）。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形象，那就是耶稣自己。就如同耶稣一样，除了罪过之外，他完全和我们相似（斐 2,7），贾师谊主教也是如此。他分享了中国人的

一切，与中国人在一起，成为中国人，与他们一起受苦，救助贫困，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向所有的人宣讲天主的国。

就像耶稣一样，他也体验过挫败，他亲眼看到他的传教事业被毁，也遭遇过被否定、凌辱，甚至死亡的威胁。但他至死一直忠于天主托付给他的使命。

如果不死于暴力，他也会因耗尽体力而昏厥，因为他爱所有的中国人，为了他们的益处他可以耗尽自己的精力，他也会牺牲自己的性命。

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时期，传教士们看到了 50 年来辛苦工作的成果被摧毁，想到他们的贾主教，他们这样说：

天主没有让他面对如此大的痛苦，提前召叫他享受天堂的赏报。他将在天堂上为他的中国祈祷！基督信仰一定会胜利！

为了纪念逝去的主教，沙勿略会士们写了很多赞扬他的文章。这里我们只列举几个能反应他个人品德的事迹。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属于天主的人。他从小的时候就受母亲的影响，后来在教区修院和沙勿略修会接受了良好的培育，是一个很有信德的人。

贾主教不仅是一个很有信德的人，而且也有非常大的爱德。他是如此的爱耶稣，以至于能毫不迟疑地面对最艰难的牺牲。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对基督的爱就受过考验，当时他亲眼看到一位非常爱自己儿子的父亲，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被天主召叫，虽然他们心里非常舍不得，但父子俩面对天主的召叫还是作出了肯定的回应。

为了坚固教友们的信德，贾师谊主教在中国面对挑战的时候从未退缩过，而这一切都是由爱而生出的。

他曾遭遇过很多的困难，我们阅读了他在饥荒年代所写下的痛苦的经历，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战争、抢劫、饥饿的困境中度过的。他为那些在大街上所遇到的不幸之人而心痛。为了救济更多的饥荒者，他毫不迟疑地变成了一个乞丐。他对穷人的怜悯和爱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有如此大的考验、痛苦和困难，贾师谊主教仍然保持着一份沉着的宁静，他的脸上显露出的是祥和的平静。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到他。他对天主的信赖是如此的大，以至于从来没有灰心放弃过。

贾师谊主教的信德是由祈祷来支撑的。他是一位祈祷的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教堂内的圣体柜前朝拜。他曾经说过，圣体圣事是一个很好的中介，他可以让传教士们帮助更多的外教人皈依天主。圣体圣事也是他喜欢的讲道题材，

他希望敬礼圣体圣事能成为教友敬拜祈祷的中心。

他非常重视节庆弥撒的参与，叮嘱新友们参与圣体圣事。为此，他也希望教友能常常办告解，他自己随时都准备听所有来找他办告解的教友们告解。

他经常进教堂朝拜圣体，这也是教友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确信传教士在圣体台前祈祷的榜样“比 100 遍的讲道更有效，因为榜样比言语更有价值”。

曾陪同主教视察过一次教务的姜神父说：

看到主教在传教行程中与天主完全结合的生活，以及坚持不懈的祈祷，让我真的很感动。

对传教士们来说，贾主教是一位真正的父亲，而且，教友也把他视为他们精神上的父亲，对他的信赖就像孩子在父亲面前一样。教友们听他讲道时，都非常的专心，主教的话总会触动到他们心灵的最深处。

他怀着信德接纳了生命末刻的病苦，他祥和地离开人世，是他与天主亲密关系的记号，这种关系伴随了他一生。